# 民國叢書

第五編

·63·

歷史・地理類

宋遼金史　金毓黻編著

宋代興亡史　張孟倫著

宋代社會中心南遷史　張家駒著

宋之外交　謝詒徵編

宋代太學生救國運動　黃現璠著

# 宋之外交

謝詒徵編

# 宋之外交



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出版
每册定價大洋四角

編印者　謝詒徵

代售者　上海大東書局

承印者　漢文正楷印書局　四馬路山東路中市　電話九一八七三

# 蔣序

謝君詒徵編宋之外交一書以相示，余喜其制斷有法，且事事以先哲之言爲評斷，而不涉以己意也，用敢爲之序曰。昔北平遭拳亂，某氏有詩曰：「一多少興亡誰管得。滿城爭說叫天兒。」嗚呼！叫天兒豈可厚非哉！讀書者自命爲通人。彼視全體民族若蚩蚩而不知其自陷於蚩蚩也。彼叫天之所能，若「嘆楊家秉忠心大宋扶保」者，蓋正我北方華族，低佪思慕彼效命疆場之勇士，歷千餘年蒙古女真之變，而不能時刻或忘者之迴聲也，孰謂華族不尚武哉！不尚武者，歷代之皇帝與識字之宰相耳。昔宋之太祖，於五代士大夫辱人賤行之餘，獨垂不殺士大夫之遺訓，船山亭林皆尊之以爲天牖其衷，馬有爲我千年以來，數萬億衆民族之所紀念所悲歌所演進遺傳，而不能旦暮相忘之邊士，而不能自效於危亡之際哉。不然則書中所謂「潯陽江賣魚，景陽岡打虎，」一亦足爲社會放一異彩。華族之經兩度經驗，而猶

能視息於此大陸者，以此也夫，以此也夫！

民國甲戌夏八月於青島

海寧蔣方震

本書據大東書局1935年版影印

# 宋之外交

## 目錄

# 宋之外交

## 第一章 緒論

中國歷史上對外關係之重要——在中國全部政治史上對外關係向佔非常重要地位，並非五口通商以後纔是如此，不過在海禁未開以前，中國的外患來自北方的大陸民族，而雅片戰爭以還，泰西的海洋國家遂發施了改變一切的影響。

現代中國外交應以過去事實爲借鏡——北方民族的侵擾中國，遠在戰國燕趙之際，秦漢以來，北國的邊防問題，始終爲政府當局力圖解決而未能解決者，歷代實際的治國才具，對於和戎禦戎等等策略的研究，正有過於對治黃河水患的孜孜研究。凡幾千年全國才智應付一種問題所得到的結論與經驗，自然必有許多地方足資後世借鏡的。我人深信居今日而講求外交政策，一方面固須參攷世界各國的史實先例，但更須從我人祖宗的親身體驗中求得教訓。在純屬工程的治水問題，尚須搜求先世的事實，何況關於人事的對外問題？

宋的外患——民族主義的悲痛——中國一切朝代中間，受到外國壓迫最甚，外交失敗最慘者無過於宋。無論宋朝最初百年的治蹟據云竟可與漢唐比盛，無論宋代的學術思想如何的發達，詩詞文章如何的優美，然而一旦外患發作，皇帝捉去了兩位，社稷覆亡了兩次，所謂中國文化也幾乎隨之毀滅，所以後世儒者要痛哭流涕的嘆息，說是『漢唐之亡，皆自亡也，宋則舉黃帝堯舜以來道德相傳之天下而亡之也！』（王夫之宋論）換句話說，歷代皆亡於自家人，而宋則亡於異族，歷代在外國侵略下，終留有一方乾淨土，而宋則斷送了全部的江山，這種恥辱的事實，再見於明朝的末年，因此前有文天祥謝枋得，後有顧炎武黃宗羲這輩愛國者起來，知識階級的腦髓中總含有民族主義的無限沉痛。

我人研究宋的覆亡之道，在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文哲思想各方面都可以找到重大的原因；我人研究的結果更充分證明了外交與內政的不可分離的關係，證明了『外交為國勢的反映。』不過同時對於宋朝三百數十年間運用的對外政策，一種弱國的對外政策，一種弱國的失敗外交，也發現了許多地方，或則可使我人警惕戒懼，或則可使我人啼笑皆非，或則可使我人大澈大悟。本書因此特從宋的時代背景、立國方針，研究到

它的外交的經過當局的人物提其要領，摭拾如此，以爲我人今日的參證，庶幾後之視今，不致復如今之視昔。

## 第二章 立國方針

宋太祖開國時的心理——宋太祖趙匡胤的得天下，正當五代十國的時節，海內杌揑不安，他雖然平定了中原，自知帝位極不穩固，所以處心積慮要爲子子孫孫策萬全之計。本他自身的閱歷經驗，有兩椿可能的亡國之禍，使他尤其憂念：（一）唐之亡，亡於藩鎮，五代之亂亂於藩鎮，野心的將領，被委了一方的重寄，便自帝自王，不服政府的命令，並以政權私相授受，養成尾大不掉的局面。一個小小强盜一旦到了京師，就不客氣地自做皇帝，把唐朝三百年的虛名了之大吉。（二）假如集中實權在中央政府以後，而武臣能夠操縱政治，又恐怕有武臣纂國的禍患，猶如他自己以殿前都檢點的軍職而做了開國皇帝一樣。這兩種禍患都由於武將操縱兵權的緣故，宋太祖懲前毖後，覺得預防的方法，第一唯有削奪現有將領的兵權，第二，使現世的將領永久不能操縱兵權。

杯酒釋兵權——關於第一個預防方法，歷史上記載他杯酒釋兵權的故事，頗為生動：

『帝因晚朝，與石守信等飲酒酣，屏左右謂曰：「朕非卿等不及此，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，朕終夕未敢安枕臥也！」守信等請其故、帝曰「是不難知、此位誰不欲為？」守信等頓首曰：「陛下何為出此言，今天命已定，誰復有異心？」帝曰：「卿等固然，其如麾下欲富貴何？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，汝雖欲不為，其可得乎？」守信等泣謝曰：「臣等愚不及此，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。」帝曰：「人生如白駒過隙，所以好富貴者，不過欲積多金，厚自娛樂，使子孫無貧乏爾！卿等何不釋去兵權，出守大藩，擇便好田宅市之，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、多置歌兒舞女，日夕飲酒相歡，以終天年，朕且與卿等約為婚姻，君臣之間，兩無猜疑，上下相安，不亦善乎？」守信等皆謝曰：「陛下念臣等至此，所謂生死而肉骨也！」明日，皆稱疾乞罷典兵、帝從之，以守信為天平節度使、高懷德為歸德節度使，王審琦為忠正節度使，張令鐸為鎮寧節度使，趙彥徽為武信節度使，皆罷宿衞就鎮，賜賚甚厚，唯石守信兼職如故，其實兵權不在也。』

比較漢高祖的狡兔死、走狗烹，以致韓彭葅醢，宋太祖的方法自然高明多多了。

防止武將的操縱大權——關於第二個方法，宋太祖認爲要使武將操縱不到大權，只要(一)使武將取不到財源，所以他設置轉運使一職；(二)使武將不能私有其軍隊，所以他創定更戍法；以及(三)使武將不能接近中央的大權，所以大官都要由文人儒士來做。

轉運使的制度規定各州的租稅收入，除各州的度支經費外，凡金銀粟帛悉數解送汴都，不得由地方當局占留。『凡一路之財，置轉運使掌之，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諸使、皆不得預簽書金穀之籍，於是財利盡歸於上矣。』所以各地武將不能取得地方上的財政權了。更戍法大概是這樣的：各州官吏選募了當地饒勇的兵卒，送入京都補充禁旅的缺額，一度做了皇帝陛下的親兵，然後將禁旅隨時分遣邊城戍守，使往來道路，以習勤苦而均勞佚，同時邊防的武將，也就不能與屬下的兵士發生私人的深切關係。

重用文臣——最後便是文臣的重用了。宋史選舉志載：『天聖初，宋興六十有二載，天下差安，時取才唯進士諸科爲最廣，名卿鉅公皆由此進，而仁宗亦嚮用之，登上第者，不數年輒赫然顯貴矣。』據當時統計，仁宗一朝，舉行進士考試十三次，中進士四，五七○人，每次中第首三名，共三十九人，其後中間只有五人沒有做到公卿。這一種選舉和

任用制度，在大體上是實行到南宋末造，比轉運使官制和更戍法要來得長久和貫澈的。

輕武與軟弱的國防政策——這些開國政策的自然結果便是造成了重文輕武的一代風氣。先說輕武的情形，按宋太祖本人創業開國，當然注意武事，重視邊防，然而朝廷猜忌將帥之心既已萌芽，到了後世不禁更為蓬勃茁長。便是宋太祖本人，既存了這種心思，不免隨時流露，無從自制，以致重要的邊防事宜，也不敢放手做去，其影響非常可怕，史書記載當時大將曹翰獻取幽州（實指石晉賂契丹的燕雲十六州）之策，『太祖謀之趙普，普曰：「翰取之，誰能守之？」太祖曰：「即使翰守之。」普曰：「翰死，誰守之？」帝不能對，遂罷曹翰之議。』

趙普是一介文臣，本能地忌武將立功，杯酒釋兵權以及轉運使更戍法，都是趙普的主謀，所謂『以猜忌之謀，動猜忌之主。』但這次曹翰的建議不行，關於宋朝國防者實非淺鮮，當時幽燕諸州既為契丹所有，黃河流域的險要形勢，亦即為契丹所據，汴都在軍事上處於不易扼守的地位，故為長久的安全著想，不能不及早規復幽燕。可是雄將的謀略，竟因猜忌而中阻，從此在宋朝全部歷史上，十九的時期，幽燕等地都在遼金蒙

古之手。

宋代將才的不易產生——在這一種傾信文臣猜忌武將的制度與心理之下，自然無從產生非常的將才。太祖和太宗都是自任大元帥從事親征的，但他們的軍事勝利，完全由於敵方的積弱無能，並非由於主帥的才能卓異。他們所平服的敵人，也都是武事久廢的藩鎮後裔（五代十國），自然無力頑抗。至於太祖太宗以後的君主都由文臣教養長大，不熟嫻弓馬軍旅的事情，既不知任用將帥，也不敢重任將帥，結果竟不得不用近幸的宦官爲帥，像神宗之用李憲，徽宗之用童貫便是。終宋之朝，只有一個蕩平小寇儂智高的狄青，和一個出師未捷身先死的岳飛，可算是卓越的大將。

岳飛之所以死——岳飛之死，非死於秦檜，而是死於猜忌的傳統政治。他的壯志未酬，一部分因爲高宗和秦檜都是金國逃回的亡命，怵於彼方兵勢的強盛，己方實力的不充，當初並沒想像到岳家軍的戰鬭力，所以決意言和不敢戀戰。但大半都因爲岳飛多才多能，名望太大，全國上下莫不向心擁戴，所以他的詞章奏疏，愈是忠義慷慨，高宗的私心猜忌也是愈加深刻，故秦檜得以莫須有的冤獄，害死他於風波亭上。關於這一點。宋以來論者頗有發明，茲不具論。

重文與士大夫階級的習氣——第二說到宋朝重文崇儒的風氣。重用文臣的制度已如前述，太祖又有不殺士大夫的遺訓規定，所以士大夫階級非常得勢；同時士大夫階級的傳統的習氣也表現得特別明顯。這種習氣不外是：（一）不負責任（二）不切實際；（三）好為黨爭。

不負責任——按士大夫大都歡喜議論是非，批評長短，所以政府舉行一事，革除一弊，處處要提防到士大夫的輿論，便是在位的皇帝也有這種顧慮，大概不在其位的士大夫，則作不負責任的議論，常使一種政策忽行忽罷不能實行到底，這在宋史上屢見不鮮；至於在位的士大夫，凡公論所謂賢者如呂端，李沆，王旦，文彥博之輩，都是因循舊規，養成一種『恂恂秩秩，苟免彈射的風氣』其實也就是怕負責任。譬如徽宗時蔡京為相，姦佞專擅已達極點，但他必須假托紹述之說，以避免責任，宋史載童貫蔡攸出師伐遼，於收復燕雲的時候『京送攸以詩，陽寓不可之意，冀事不成，得以自解。』因此真正有為的賢者王安石，預備負責行事的時候，要拿『天變不足畏，人言不足卹，祖宗之法不足守』的三不之說來杜絕妄肆批評者之口。

不切實際——說到宋士大夫的不切實際，幾乎賢不肖皆然，沒有一個例外。譬如范

仲淹王安石蘇軾程頤這些人也算得宋朝文章學術的代表了。但范仲淹當西夏邊防緊張的時期，遇到張載因他欲喜研究軍事，有征服西夏之志，便警告他說：『儒者自有名教，何事於兵？』於是張載折節讀書，創立宋學的『關派，』後世稱爲『横渠先生，』所以范仲淹一句空言，雖造成了一位名儒，卻斷送了一員名將。再如宋神宗與王安石談及三國諸葛亮與唐魏徵的治蹟才具的時候，王安石便大言不慚，菲薄孔明魏徵，以爲不足掛齒，而勸神宗效法堯舜，則自有皐夔稷契來做翊贊的賢臣。他這般輕視魏徵諸葛實際的長才，而誇張皐夔稷契傳說的人格，可見其浮而不實的一斑。至於當時號稱蜀黨領袖的蘇軾，不過一個新聞記者的材料，蘇東坡攻擊王安石的奏疏中說道：『國家之所以存亡者，在道德之淺深，不在乎强與弱；歷數之所以長短者，在風俗之厚薄，不在富與貧。』而於辨募役法中又流露了一種士大夫自私自利的心事說，『士大夫捐親戚，棄墳墓，以從官於四方者，宣力之餘，亦欲取樂，若廚傳蕭然，恐非太平之盛觀。』而有名的文彥博，也有皇帝『與士大夫治天下，非與百姓治天下』的奇談。（因爲神宗說：『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便，然於百姓何所不便？』）

好爲黨爭——與不負責任，不切實際二者相並而行的便是好爲黨爭。例如號稱洛

黨領袖的程頤罷，司馬光與呂公著共同上疏荐他，說他『力學好古，安貧守節，言必忠信，動遵禮度。』果然程頤一做了哲宗的講師，大多講究採用千百年前的古禮，於是蘇軾也看不過去了，稱他不近人情，終於雙方發生嫌隙，造成洛蜀黨議，互相攻擊不休，反給蔡京輩小人造機會。而且他們腦筋中既充滿了黨見，自然顧不到國家興亡和社會是非了。所以北宋人才雖多，幾乎完全銷磨於黨爭之中，計在太祖，太宗，真宗三朝則有趙普與盧多遜，王欽若與王曾，寇準與丁謂等等之爭，仁宗朝有廢后與濮議之爭，隨後愈趨愈烈。到了王安石新法起則新黨與舊黨之爭，幾使全國士大夫不歸於楊，則歸於墨；哲宗朝初則有洛蜀朔的朋黨之分，繼則有章惇蔡卞等造成黨禍。到徽宗時蔡京秉政，黨禍愈熾；大家攻擊傾軋之不暇，那裏有人高掌遠蹠。注意到外患的防範；那裏有人埋頭苦幹，來從事切實的整頓。論者謂北宋士大夫『聲容盛而武備衰，議論多而成功少。』實在不錯。曾文正也說了一句傷心的公平話道：『宋儒寬於責小人，而嚴於責君子。』

到了南宋理學大盛，士大夫羣相研究性命的奧微，朋黨的鬬爭變而為朱陸異同，門戶的衝突。再說南宋的詩詞之藝，其情辭激烈，悲歌慷慨，富於民族主義思想的頗不乏

人，如呂本中，陳與義，曾幾，陸放翁，辛棄疾皆是，然而除了一個文天祥以外，都只是一時的情感勃發，莫有能夠始終奮鬪，挽回已死的人心，挺救將覆的邦國。一旦敵人兵臨城下，儒士文人既無濟於事，同時既無可用之將，亦無可戰之兵。一代的風氣如此！

人心的不能振作——在這種時代背景下，對外交涉的失敗，不僅不能刺激人心，反使政府人民更加懦怯偷惰，造成對外苟安，對內晏安的局面。政府方面可拿宋真宗天書封祀一事，以爲絕好的證明。宋真宗自景德元年，澶淵親征，與契丹議和以後，終以未能屈服契丹，反要年年賂遣銀兩絹匹，頗以爲恥，於是聽了王欽若之言，異想天開，稱有天書祥瑞降臨，旨在神道設教，希望彼迷信的契丹民族，認宋朝爲天意所嚮，從風而服，又希望民衆亦如此相信，大家忘記國恥，自欺欺人，於是不僅外交已告失敗，內政上亦隨之不振。

人民方面，本來厭惡干戈的五代以後的民衆，在重文輕武的風氣下，更弄得萎靡不振，毫無雄武之氣，同時又佞信釋老，僧尼遍國，再加賤商賞儒，不事生產者爲數遂多，社會風俗愈趨不良，大家玩忽貪歎。一輩縉紳先生，『賢者建宮牆以論道，其次飾亭榭以冶遊，其下攘民財以自潤。』這種情形自昔已然，隨後則愈趨愈烈。當南宋將亡之際，而

史書稱文天祥「平日自奉甚厚，聲伎滿前。」正氣歌的作者尚且如此，他人可知！

總而言之，宋朝具有隋唐五代的時代背景，於是造成了它的猜忌的政治，和萎靡的風氣，國內的情形，既然如此，對外的交涉自然失敗，同時外交的失敗，益發加重它國勢的衰落和人心的瓦解，互相因果，打成一片。然而堂堂大宋，處於急迫嚴重的國難期間，而君臣上下，依然甜歌醉舞，沉湎不醒，終是中國民族史上的一大汚點。

但是從這羣文人的黨爭外患的急迫中我們看出兩件要點：第一、歷代右文的結果，末代一定發生黨爭，黨爭的內在原因，果然由於帝王專制下之知識階級，都帶幾分女性爭寵的妬意，然其發端必出於政府的操縱，民意激昂靠的是羣衆一時之氣，必於政府之行動不利，執政者就利用人多的關係，使他內部分裂，在野的氣勢愈盛，則在朝的箝制之術愈工，到了南宋經秦檜賈似道的摧殘，從政治方面逃到了性命詩歌，朱陸異同，不過是妬意的餘波，連黨爭的氣也沒有了，所以宋朝亡國之慘過於明，而死節之士獨少。第二、知識階級雖沒出息，但是社會下層的活動分子，在北宋末期還有可觀，潯陽江賣魚，景陽岡打虎，確確有這一班好漢，王夫之論宗留守渡河之意，確是深得當時的形勢，而後來韓岳的成功，居然保了南宋一時的天下，也是因為他們能收羣盜以為己

用。這一點民族精神倒爲中國留了萬古不磨的勝蹟，以爲後來朱元璋復興的基礎。

## 第三章 外交經過

北宋南宋兩朝，與中國發生常川和密切的外交關係的外國，自然首推契丹（後改國號爲遼）金（即女真）和蒙古（即元），其次爲西夏，再次爲交阯、高麗，而宋史外國列傳中更載有大理、占城、真臘、蒲甘、邈黎、三佛齊、闍婆、勃泥、注輦、丹眉流、天竺、於闐、高昌、回鶻、大食、層檀、龜茲、沙州、拂林、流求、定安、渤海、日本、黨項等民族或國家，本書因側重宋的外交政策，所以除了有長期的正式外交關係的契丹、金、蒙古、西夏以外，對於其他外國民族和國家一概從略，以省篇幅。

### 第一節 契丹

太祖時無直接的正面衝突——宋與契丹的軍事接觸開始於北漢（五代十國之一，今山西西北部）方面。北漢的開國君主劉崇，乃五代漢高祖劉知遠之弟，周既滅漢，劉崇乃據太原而稱北漢，因爲勢力弱小，所以父事契丹，等於契丹的保護國。當宋太祖

開寶年間，南方各國幾乎全部在宋的勢力範圍內，但北方則幽燕薊各州（今河北省）形勝險要之區盡在契丹掌握中，實為宋室唯一心腹之患，至於山西的北漢，以地勢而論，既不及燕薊的重要，以實力而言，只等於契丹的分遣隊而已，所以從戰略上言，應該先取燕薊，再下太原。當時趙普亦有鑒於此，曾勸太祖謂北漢當西北邊疆，不如暫留爲那方面的緩衝國。太祖頗以為然，雖屢次遣將往討，並不亟圖滅漢，契丹差不多每次都派重兵援漢，因此與宋師相遇，幾次衝突，宋方頗獲勝利；可是宋太祖始終避免與契丹作正面的衝突，終太祖之世，燕薊方面並無戰爭，即北漢亦未消滅。

太宗滅北漢而圖燕薊——策略的錯誤——宋太宗即位後，立志收復燕薊，但他所取的策略是先行蕩平北漢。太平興國四年（979）太宗自爲大元帥，率領潘美，崔彥進、李漢瓊、劉遇、曹翰、米信、田重進等將伐漢、契丹軍來援，為宋將郭進所敗，戰至五月間北漢主劉繼元遂降，共得州十，軍一，縣四十一。於是太宗擬乘勝直下幽燕，諸將以為軍隊疲憊，餉糈缺乏，不宜進兵，獨有崔翰主張：『所當乘者勢也，不可失者時也，取之易！』太宗意乃決，五月間就從太原出發，浩浩蕩蕩的東進。明陳邦瞻論太宗這次用兵的失策說道：『宋之受制夷狄，由失燕薊，其不能取燕薊，失在先下太原。昔王朴與周世宗謀

取天下、欲先定南方，次及燕，最後乃及太原。蓋燕定則太原直罝中兔耳，將安往哉？太祖趙普雪夜之言，亦朴遺意也。太宗一日忘其本謀，急於伐漢，盡銳堅城之下，僅能克之，師已老矣。復議攻燕，所謂强弩之末，勢不能穿魯縞，一敗而沒世不振，再舉再失利皆由太宗不知天下之大勢倒行求前，以致顛蹶也！』（宋史紀事本末第十二卷終）

高梁河之戰關係重大——可是太宗軍行所向起初是非常順利，六月下旬數日之間，連下契丹的東易州、涿州、幽州、到了七月順州薊州亦相率歸降，僅餘耶律學古獨守燕京，其勢窮蹙，這時宋方聲勢浩大，前途樂觀，正可一舉而復中國舊有的河山，而以長城爲國界，誰知契丹耶律休哥的援兵來到，與宋太宗戰於高梁河，太宗大敗，引師南還，耶律休哥追至涿州太宗急乘驢車逃免，已經攻下的地方又一舉而還契丹。這次高梁河之戰，實爲宋遼金元軍事外交史上一次決定的戰爭 Decisive battle 這次戰爭的失敗開了以後一蹶不振的局面。太宗的銳氣已挫，不能再事大舉，而後世子孫碌碌，要像太宗那樣旬月之間連下數州，幽薊在握，直迫燕京的破竹之勢，永不復得了。所以高梁河之敗，雖爲太宗進取太猛的自然結果，亦是宋代的不幸事。

『安內以養外』的主張——自後太宗對於契丹仍用兵數次，大多先勝後敗，於是

太宗的雄心漸漸冷淡，終於改變他以武力鞏固邊疆的政策，而採納大臣弭戰息民的主張。翌年十二月張齊賢『先本而後末，安以內養外』的奏疏，深可表示輿論的轉變，和政府的意向的。張齊賢道：

『……聖人舉事，動在萬全。百戰百勝，不如不戰而勝。若重之愼之，則契丹不足吞，燕薊不足取。自古疆場之難，非盡由敵國，亦多邊吏擾而致之。若緣邊諸砦，撫馭得人，但使峻壘深溝，畜力養銳，以逸自處，寧我致人，此李牧所以用趙也。所謂「擇卒不如擇將，任力不如任人，」如是則邊鄙寧，邊鄙寧則輦運減，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。臣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，豈止爭尺寸之事，角强弱之勢而已乎？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，安內以養外。陛下以德懷遠，以惠勤民；內治既成，遠人之歸，可立而待也。』

但這時太宗仍希望能結合外援，夾攻契丹。太平興國六年七月，史稱太宗遣使渤海和高麗的情形，大致說：『渤海本高麗別種，契丹嘗取其扶餘城爲東丹府，時帝將大舉伐契丹，遣使賜其王詔書，令發兵以應，約滅遼之日，幽薊土宇，復歸中朝，朔漠之外，悉與渤海，竟無至者，帝後復遣使如高麗，諭令發兵西會，亦不能應。』

外援既然不成，太宗雄心未死，到了雍熙三年（西曆九八六）復作最後的企圖，派了

曹彬潘美往攻契丹，結果一場大敗，以『楊老令公』著名後世民間的大將楊業，兵敗戰死。於是太宗決意與契丹修好，遼臣何承矩向契丹挑釁生事，亦被免職。按太宗時期，英勇的武將之多，為宋一代之最，計有曹彬，郭進、尹繼倫、楊業、田重進、折御卿等，大可有為的黃金時機便這樣胡亂地度去了。

真宗初錢若水論兵——真宗即位以後，翰林學士王禹偁上疏言外交，主張遣使與契丹修好結盟，可是契丹無意言和，仍不斷前來作流寇式的侵掠，宋大兵至則遁去。咸平三年，真宗詔詢錢若水備禦契丹之術，若水上疏，主張任將守邊，並奪取幽薊險阻之地；內稱：『晉桑維翰不背約之言出於微弱。故相趙普之謀，姑冀息民，慈非遠謀，臣所不取。嚴尤謂自古禦戎無上策，臣竊笑之。守在四夷，制勝以靜，非上策而何？臣聞唐魏博一鎮偏兵戎固不衆於今日，而胡騎未嘗南牧者，以幽薊為北門，扼其險阻故也。石晉割地之後，由定武達滄海，千里受敵，雖設二關，鎮之以重兵，莫可以禦。故晉末渡長河，漢初復擾邊徼，以周世宗之英武，曾未能絕其寇中山，竊上黨。（按：此皆五代時契丹南侵的故事。）今御札詢備禦翦滅之術，臣以為不得幽州，未可翦滅也……』

偷安屈服的外交之開始——景德元年（一〇〇四）契丹大舉入寇，全國震疑，

羣臣多主張遷都避鋒，臨江人王欽若請幸金陵，閬州人陳堯叟請幸成都，假如有一實現，南宗偏安的局面這時就得開始了。當時幸有寇準一人竭力主戰，說道：『陛下神武將臣協和，若大駕親征，敵當自遁；不然，出奇以撓其謀，堅守以老其師，勞佚之勢，我得勝算矣。奈何棄廟社，欲幸楚蜀，所在人心崩潰，敵乘勝深入，天下可復保耶？』真宗無奈，只得親征，到了澶州（河北濮陽縣）四方勤王的將士望見御駕，高呼萬歲，聲勢大盛，契丹不禁膽怯，宋方獲到一次小勝。但當時畏懼契丹的心理仍很緊張，所以又派了曹利用與契丹議和。這次議和的經過，可以看出真宗的無用，和當時朝廷已陷於偷安苟且的空氣中了。史載同年十二月『契丹使韓杞持書，與曹利用俱來請盟。利用言契丹欲得關南地。帝曰：「所言歸地，事極無名，若必邀求，朕當決戰。若欲財貨，漢以玉帛賜單於，有故事，宜許之。」時準不欲賂以貨財，且欲邀其稱臣，及獻幽薊之地，因畫策以進曰：「如此，則可保百年無事，不然，數十年後，戎且生心矣。」帝曰：「數十年後，當有捍禦之者，吾不忍生靈重困，姑聽其和可也。」準尚未許，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，準不得已，乃許其成。復遣曹利用如契丹軍，議歲幣。帝曰：「必不得已，雖百萬亦可。」準聞之，召利用至幄，謂曰：「雖有勅旨，汝所許過三十萬，吾斬汝矣！」……利用竟以銀十萬兩，絹二十

萬匹，成約而還。』

王夫之評道：『澶洲之役，寇準折王陳而請決戰，而日與楊大年飲博歌呼，故王譖之曰「準以陛下為孤注。」後之論者曰：「準以靜鎮之也。」生死存亡，決於俄頃，而徒以靜鎮處之可乎？無所見而徒矜靜鎮，則十萬橫磨之驕語，且以速敗，誤人家國，必此言矣。夫鎮靜者必有所以鎮而後能靜也。平仲之所恃奚在哉？兵甫一動而議和之使先至，利用甫歸而議和之使復來，則敵之無鬭志可知也。契丹之滅王重珂也，石敬瑭為之內主；其滅石重貴也，杜威趙延壽為之內主。契丹不能無內應而殘中國，其來舊矣。此內之可恃也。契丹之來實挾一索賂之心，故其攻也不力，戰也不怒。寇氏知之深，持之定，特兵謀尚密，不欲昌言於衆，以啓嘵嘵之辨論耳。』

這裏應該注意的，即寇準的深謀遠慮，係為猜忌的政治所打消，而苟安屈辱的外交是從此開始了。

自後契丹每有誅求，宋方便不敢不應。真宗其餘的時期，對於契丹除每年敬謹送奉歲幣以外，有一件事情可記。景德二年，宋遣孫僅至契丹，賀其太后生辰，致書自稱南朝，契丹為北朝，確定了宋與丹契的對等地位。可是到了仁宗慶歷二年，輸送歲幣的公文

中，又順從了契丹的要求，稱『納』歲幣若干，按『獻納』係下奉上之辭，這樣一來，歲幣等於朝貢，宋又從丹契的對等國，降而為契丹的附屬國了。

契丹渝盟——這時候仁宗正對西夏用兵，無力旁顧，契丹遂違犯景德元年和約的規定，前來虛詞恫嚇，索取關南十縣地，宋既乏分兵戰鬪的力量，又無武力抵抗的決心，所以要答覆這個要求很不容易，於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外交家富弼便應運而生，為國宣勞，不辱使命，他出使的全部經過如下：

中國第一個大外交家——『先是上得邊吏奏知契丹使且至，為之旰食；歷選可使者，羣臣皆憚行，宰相呂夷簡以右正言富弼薦。入對便殿，頓首曰：「主辱臣憂，臣何敢愛死？」上為動容，遂命弼為接伴使，特未等始入境，中使慰勞，稱足疾不拜。弼曰：「吾嘗使北，病臥車中，然聞命輒拜，今中使至而君不起，此何禮也？」特末矍然起，使人掖以拜命，至京師，詔以弼為回謝國信使。弼至契丹，契丹以劉六符為館伴，六符言契丹主堅欲割地，弼曰：「此貴國意在敗盟，假此為名耳，我朝惟有橫戈以待。」及入見契丹主，弼責之曰：「兩朝繼好，垂四十年，一旦忽求割地，何也？」契丹主曰：「南朝違約，塞鴈門、增塘水、治城隍、籍民兵，此何意耶？羣臣皆請用兵，我以為遣使求地，求而不得，用兵未為晚也。」

弼曰：「北朝與中國通好，則人主專其利，而臣下無所獲，若用兵則利歸臣子，而人主蒙其禍，故勸用兵者，皆爲其身謀，非爲國計者也。」契丹主驚曰：「何謂也？」弼曰：「石氏欺天叛君，末帝昏亂，神人共棄；是時中國狹小，上下離叛，故北朝全師獨克，雖虜獲金幣，充物諸臣之家，而壯士健馬，喪失大半，此誰任其禍者？今中國一統，提封萬里，所在精兵以數萬計，北朝用兵，能保必勝乎？就令其勝，所亡士馬，羣臣當之歟？抑人主當之歟？若通好不絕，歲幣之利，盡歸人主，羣臣何利焉！」契丹主大悟，首肯者久之，乃曰：「微卿言，朕不之知，然吾所求者，祖宗故地耳。」弼曰：「晉以盧龍賂契丹，周世宗復取關南，此皆異代事，宋興已九十年，若各求異代故地，則盧龍一道，寧當爲北朝所有耶？」（按：盧龍即燕雲十六州）

拒絕割地——拒絕用「獻」或「納」——『翌日，契丹主召弼同獵，引弼馬使近己，問所欲言，弼對曰：「臣唯欲和好之能久耳。」契丹主曰：「得地則和好可久。」弼曰：「南朝皇帝，使臣言於陛下曰：北朝欲得祖宗故地，南朝豈肯失祖宗故地耶？且北朝旣以得地爲榮，則南朝必以失地爲辱。兄弟之國，豈可使一榮一辱哉？」契丹主大感悟，乃俾弼還，議增歲幣以誓書來，上允增銀幣各十萬，弼至京，請於誓書內增三事：一、兩界塘淀，毋

得開展，二、不得無故添屯軍馬，三、不得容納逃亡，書既就，因請錄副以行。弼行至河北，自念：「所增三事，皆契丹前約，萬一書辭有異同，則彼必疑吾，大事敗矣。」乃密啓副封觀之，果如所料，即馳至京師，叩閤門求對，上召呂夷簡問之，夷簡從容曰：「此誤耳。」弼語頗侵夷簡，晏殊以語和解之，弼怒曰：「殊奸邪，黨夷簡，誤陛下事。」殊，弼婦翁也，其剛正如此。上命王拱辰易書以行，及至北，契丹主必欲於誓書增一獻字；弼爭曰：「獻乃下奉上之辭，非所施於敵國，南朝爲兄，豈有兄獻於弟者耶？」契丹主曰：「改爲納字何如？」弼曰：「亦不可！」契丹主曰：「納字自古有之，」弼曰：「古惟唐高祖借兵突厥，以稱臣之故，或稱獻納，則不可知，及後頡利爲太宗所擒，豈復更有此禮？」契丹主見弼聲色俱厲，知不可奪，曰：「我自遣使往南朝議之耳。」於是復遣六符與弼俱來，弼驛奏曰：「彼求獻納兩字，臣以死拒之，其氣折矣，不可許也。」後朝廷卒以納字與之。弼之初奉使也，聞一女卒，再奉使，聞一男生，皆不顧而行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：「徒亂人意耳。」

無忘國恥，益修武備的正議——其後上以弼爲樞密副使，弼不受曰：「增歲幣非臣本願，特以西事方急，未暇與北方角，故弗敢以死爭耳，功於何有，而敢言受賞乎？願陛下益修武備，無忘國恥。」卒辭不拜。』

仁宗崩後，英宗繼立，在位期短，並無大事可記，惟治平二年，與契丹開始商議邊界，這事直到神宗熙寧八年纔告解決。又治平三年，契丹改國號為遼。

神宗時與遼方界務爭議——神宗即位後，頗以對邊問題為憂，所以任用王安石變法，一大半也是為了國防的整頓。但當時宋遼雙方都是承平日久，兵驕將惰，實在很難振作。終神宗之世，用兵西夏，戰勝交阯，收復河湟（今甘肅武威以南，黃河湟水兩流域之地，為羌族所居，王安石用王韶平復之。）但對於大敵遼國，曾未有所動作。對於外交上，只有會議邊疆問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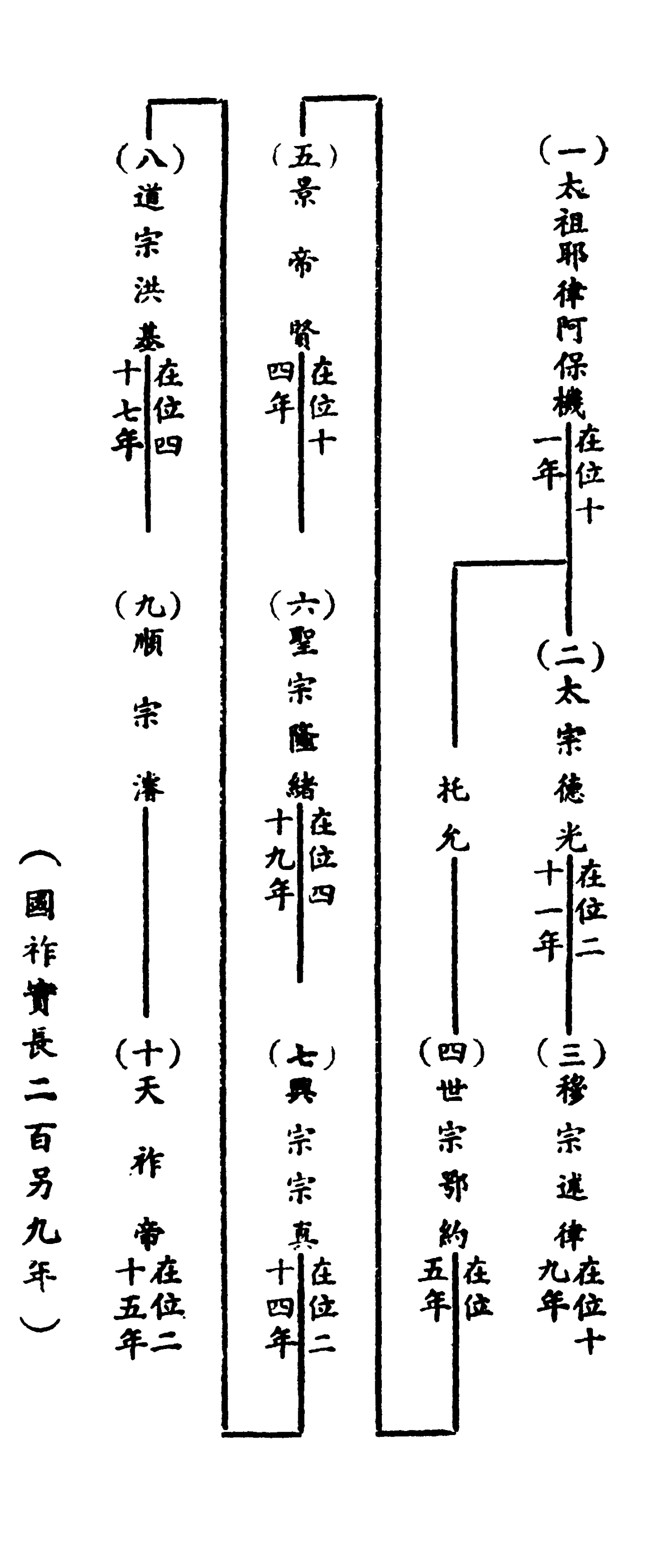
王安石『將欲取之必先與之』的政策——熙寧八年，宋使劉忱呂大忠等與遼蕭素在大黃平會議疆界，起初要求以蔚利應三州分水嶺土壟為界，劉忱呂大忠與蕭素同往實地考查，並無土壟。於是遼方主張，但以分水嶺為界，劉忱認為分水嶺一詞太籠統，所以相持甚久，不能議定。起初劉忱等臨行時，神宗手勅道：「遼理屈必忿，卿姑如所索與之。」忱抗不奉詔。呂大忠也說：「果如所請，必將失地數百里，彼遣一使來，即與地數百里，若盡索關南亦與之乎？」於是遼方再派蕭禧到宋廷堅請，神宗遣沈括與議，括取地圖與蕭禧辯，禧意始屈。既而括至遼，遼相楊益戒來就議，理屈辭窮。便恫嚇道：「數

里之地不忍，而輕絕和好乎？」括正色答道：「師直爲壯，曲為老，北朝棄先君之大信，以威用其民，非我朝之不利也。」前後會商六次，遼人知不可奪，於是要求以代州的大池爲界，神宗終於聽了王安石『將欲取之，必先與之』的話，頒詔以分水嶺爲界，這樣一來，東西割予契丹地方七百里，這可說是王安石要革新內政，不得不對外妥協而付出的代價。

自後遼方君臣晏安，國勢漸衰，到徽宗宣和七年（一一二五）而亡於金，其宋遼的外交關係上無甚可記。至於宋方聯金滅遼的事實則附見於本章第三節。遼亡後，遼將耶律大石西奔，據克埒木（即今俄領塔什干 Tashkent）稱帝，號爲西遼，傳國百餘年，與金相終始。西遼與南宋遠遠隔絕，並無任何外交的關係。

遼帝系表

（遼太祖耶律阿保機於五代梁貞明二年即西曆九一六年稱帝）




## 第二節　西夏

宋對西夏的外交關係，始於太宗時期，在真宗，仁宗，神宗三朝，緊張到了極點，所以其重要不亞於對契丹的關係；以發生的時間而論，又是先於女真蒙古，故述契丹後略述西夏。

西夏略歷——西夏拓跋氏，乃吐蕃民族。唐季夏州（今陝西横山縣）將領拓跋思恭，

平黃巢有功，賜姓李氏，唐亡後，遂世鎮朔方，不通中國。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，西夏主李繼捧入朝，獻銀夏綏宥四州（今陝西米脂橫山綏德諸縣及鄂爾多斯右翼前旗。）但繼捧的族弟李繼遷不肯歸順，流亡各地，連絡豪族，勢力漸漸強大，西夏人因李氏祖宗積有恩德，所以依服他的人很多。太宗雖派兵往討，但未盡力將他消滅。到了雍熙三年，繼遷更投降契丹，受冊封爲夏國王，於是騷擾愈甚。淳化三年宋政府大兵往討，繼遷請降，宋封他爲銀州觀察使，賜姓名爲趙保吉，但不久又叛。終他的一生，降了復叛者不止三次，每降一次則爲勢愈大。宋再三企圖用懷柔的政策，要使其心服。

真宗時失靈武　——真宗咸平四年，帝命張齊賢巡邊，齊賢奏稱靈武（今甘肅靈武縣）孤城難守，徒使軍民六七萬陷於危亡，不如放棄；永興通判何亮力爭，以爲靈武地方千里，表裏山河，決不可棄。真宗不能決，命羣臣集議，楊億以爲棄之便，其他執政者又認爲靈武乃必爭之地，假如喪失了，沿邊諸郡，皆難防守。李沆時爲首相，建議說：「保吉不死，靈州決非朝廷所能有，莫若密召諸將，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，如此則關右之民，得所息肩矣。」按在當時苟安姑息的情形下，既不肯大舉伐夏，那末李沆的策略也是不錯的。但真宗不從，派王超爲都部署，領步騎六萬往援靈武，於是趙保吉先發制人，大舉

入寇，竟將靈武攻下，盡得城內的人口財貨，實力便益加雄厚了。

真宗姑息政策遺禍後世 ——咸平六年，李繼遷與西涼交戰，中箭身死，子德明立，契丹封他為西平王。知鎮戎軍曹瑋上書道：「保吉擅命河南二十餘年，兵不解甲，使中國有西顧之憂，今幸天奪其魄，子幼國危，願假臣精兵，出其不意，擒德明致諸闕下，復河南為郡縣，此其時矣。」但真宗昧不曉事，仍欲以恩德收復德明，不納曹瑋的建議。景德三年，德明奉表歸款，宋政府亦封德明為西平王，可是到了乾興二年，德明又來攻宋麟州，宋方失利。

西夏建國 ——按曹瑋對於西夏的遠慮，是超時代的，自真宗封德明為王後，他曾說道：『契丹不足憂，終為中國患者，其西夏乎？吾嚮者鎮環慶，常與德明通往來，見其子元昊，纔數齡，然姿貌雄傑，瞻視不凡，他日得志，其必為西垂憂矣。』元昊長大後，暴然雄毅大略，野心勃勃，曾諫其父勿臣服於宋，說道：『英雄之生，當帝王耳！』德明死於仁宗元聖九年十月，元昊立，於是夏勢日振，領土日闢，到景祐三年，奄有銀、夏、綏、宥、靜、靈、鹽、會、勝、甘、涼、瓜、沙、肅共十四州（大多在今甘肅陝西）地方萬里，雄兵五十萬人。到了寶元元年十月（一〇三八）元昊遂自西平王晉稱皇帝，國號夏，並根據當時小國稱帝應請

大國冊封的慣例，表請宋朝加以冊封。宋政府接表後，羣臣議論不一，遲遲無所動作，到了二年六月，纔下詔削奪元昊王爵，斷絕貿易關係，和懸賞購取元昊的首級。於是元昊遂反，侵略西北邊疆。前後構兵六年之久。

宋夏勢力的比較 —當時宋方對付西夏的將帥，起初爲范雍，夏竦，後來爲范仲淹，韓琦。仲淹與琦都是北宋的人才，然而也是十出九敗，覆軍殺將，仲淹尤其書生談兵，不切實際，二人至多也不過如王夫之所謂『韓范能爲張子房李長源，而不能爲韓彭李郭。』至於夏竦，雖爲時論所輕，且被後世指爲奸邪，但他論宋夏雙方當時的勢力，講得很透切，他奏道：『繼遷當太宗時，逋逃窮蹙，而累歲不能剿滅。先帝惟戒疆吏謹烽候，嚴卒乘來即逐之，去無追捕。然自靈武陷沒，銀綏割棄以來，假朝廷威靈，其所役屬者，不過河外小羌耳。況德明元昊，相繼猖獗，以繼遷窮慼比元昊富貴，勢可知也；以先朝累勝之士，較當今關東之兵，勇怯可知也；以興國習戰之帥，方今沿邊未試之將，工拙可知也；若分兵深入，糗糧不支，進則賊避其鋒，退則敵躡其後，勞師費糧，深可虞也；若窮其巢穴，須涉大河，長舟巨艦，非倉卒可具，若浮囊挽綆，聯絡而進，我師半濟，賊乘勢掩擊，未知何謀可以捍禦？臣以爲不較主客之利，不計攻守之便而議追討者，非良策也！』

夏竦主守——所以夏竦主守，他條呈防守策十條『一、教習強弩，以爲奇兵；二、羈縻屬羌以爲藩籬；三、詔唃廝囉，并力破賊；四、度地勢險易遠近，砦柵多少，而增減屯兵；五、詔諸路互相應援；六、募土人爲兵、以代東兵；七、增置弓守壯丁，以備城守；八、併並邊小砦，以完兵力；九、聽關中民入粟贖罪，以贍邊計；十、損並邊冗兵冗官，以紓饋餉。』

仁宗用兵失敗——但仁宗決定用兵，詔鄜延涇原兩路會兵進討。這時范仲淹鎮鄜延，韓琦鎮涇原，二人主張不能一致，反覆申論，迄不會兵進討。於是元昊入寇，韓琦單一面獨當，琦以全部士卒交付大將任福統率禦寇，任福與元昊精兵戰於好水川（今名甜水河，在甘肅隆德縣東，）宋軍地勢不熟，任福雖勇，然臨敵受命，所統兵皆非素所熟悉，結果宋軍戰敗任福與饒將桑懌均戰死，士卒死者萬三千人，於是陝西四路的精華一朝俱盡、同時西夏方面，精兵傷亡亦多，元昊之勢稍弱。

宋委曲求和——仁宗慶曆三年，宋方設法與夏議和，夏方條件苛刻，既不肯稱臣，又要求宋方給予歲幣。當時晏殊等執政，厭戰畏兵，一切應承。富弼諫道：『元昊臣契丹而不臣我朝，則是謂契丹無敵於天下矣，須令稱臣，乃可許和。』蔡襄亦謂：『元昊自稱兀卒，既又譯爲吾祖，特以侮慢朝廷，使朝廷賜之詔，而亦曰吾祖，是何等語耶？不可許其請！

『仁宗一概不聽。慶曆四年末，宋遣使册封元昊為夏國主，賜對衣黃金帶銀鞍勒馬，銀二萬兩，絹二萬匹，茶三萬斤；並規定歲賜絹十萬匹，茶三萬斤。但元昊在國內稱帝如故，宋所遺絹茶，號稱為賜。夏則以朝貢受之。』

宋再失機會——慶曆八年元昊死，子諒祚即位，年僅期歲，母族當政，於是有人建議以官爵授夏三大將，使各據一方，以分西夏的國勢但宋政府又納陝西安撫使『宰人之喪，非所以柔遠人，不如因而撫之』的迂語，繼續所謂懷柔政策，遣使册封諒祚為夏國主，再蹈真宗咸平六年的覆轍，第二次喪失良好的機會。後來諒祚長大，果然又於英宗初即位時前來寇邊，幸當時宋集中將士於西北，邊備修飭，西夏未能得志。

神宗任用非人　神宗熙寧時期諒祚已死，子秉常幼弱，母梁氏輔政，殺其大將李清，頗有內亂，未嘗不是興師問罪的機會，但神宗用宦者李憲爲帥，孫固諫道：『伐國大事而使宦者為之，士大夫孰肯爲用耶？』神宗不納。於是李憲，种諤，高遵裕，劉昌祚，王中正等（亦宦官）分道進兵，諸將會師靈州，獨李憲不至，後來諸將兵敗，遵裕等皆貶官，李憲獨免。李憲上再舉之策，神宗以為涇原安撫制置使，知蘭州。到了元豐時期，神宗便二次出兵，信用徐禧，建城於永樂，（今陝西米脂縣西，）禧寡謀輕敵，結果城破身死，一場

大敗，神宗於是無意對夏用兵。

和平，宋與夏俱衰——哲宗時候，夏遣使要求蘭州米脂等五砦，司馬光主張許之，俾維持和平，文彥博亦以為然，幸有熟悉邊防的朝臣，指出蘭州等地的形勢重要，遂未允許西夏的要求。後來夏人數次來寇，宋任用章楶為將，頗獲勝利，夏勢漸漸不振。徽宗時宦者童貫主持對西夏用兵，曾獲小勝，南宋初，西夏主仁孝受金冊封嗣後與宋隔絕不復通使。夏金邦交和睦，曾有八十年的和平，到南宋寧宗嘉定四年，夏主遵頊立，破壞和平，與金交戰，兩國俱受損失。這時蒙古已崛起北方，屢次侵夏，到了理宗寶慶三年（一二二七），遂為成吉斯汗所滅。計西夏自元昊建國稱帝，至末帝晛，共歷十世，實得一百九十三年。

西夏帝系表

太祖李繼遷——太宗德明——（一）景帝元昊（稱帝後在位十一年）——（二）毅宗諒祚（在位十九年）

（三）惠宗秉常（在位十九年）——（四）崇宗乾順（在位五十二年）——（五）仁宗仁孝（在位五十五年）——（六）桓宗純祐（在位十二年）

（七）襄宗安全（在位六年乃桓宗後弟）——（八）神宗遵頊（在位十二年乃襄宗姪）——（九）獻宗德旺（在位三年）——（十）末帝晛（在位一年乃獻帝姪）

## 第四節 金

女真(即金)即古代肅愼國的轉音，為契丹東北部的東胡民族，也就是近世滿州的祖先。宋初，女真極其微弱，到了遼的中葉漸强，居塞內者入遼籍，為熟女真，居塞外者自為部落，叫做生女真，酋長姓完顏氏，世奉遼命。爲女真節度使。遼末造天祚帝時，生女真酋長吳雅東已有叛遼的異志，其子阿骨打姿貌雄傑，有大志，吳雅東卒，遂襲位，督率部下，整軍經武。到了徽宗政和四年(一一一四)阿骨打聚衆二千五百人叛遼，初次接觸，即大勝遼兵，其後數月之間又屢戰屢勝、部下擴充至萬人，於是於政和五年元旦日、即皇帝位於愛新水(即今胡爾哈河，又名牡丹江)建國號為『金』便是歷史上的金太祖。遼主聞訊，派騎卒二十萬步兵七萬，大舉伐金，與阿骨打軍戰於達嚕克城(即遼之黃龍府轄地，其府城爲今寧安縣南之東京城)遼軍又大敗，步卒盡殲，不能復振。

金方用兵這樣的順利，一大半因爲當時遼天祚帝荒淫失政，武事久廢的緣故。即如文弱的宋，這時也起了圖遼之心。政和元年，宦者童貫，既戰勝西羌，擊敗西夏，又想僥倖立功，自請奉使至遼，作實地的觀察，來實行攻遼的計劃。他到了遼，益發相信遼勢不振，

機會可乘，他又帶回來燕人馬植，荐於朝廷，植獻滅遼之策，說道：『女真恨契丹切骨，而天祚荒淫失政，吾若自登萊入海，結好女真，與之相約夾攻，遼可圖也！』又道：『遼國必亡，陛下念遺民塗炭之苦，復中國往昔之疆，王師一出，必壺漿來迎。萬一女真得志，先發制人，則大事去矣。』徽宗甚以爲然，賜馬植姓趙，名爲趙良嗣。重和元年，宋遣馬政由海道至金，與金主通好，宋金的外交關係於是開始。宣和元年，金主遣使李善慶持國書來，徽宗詔令蔡京等曉諭金使聯兵攻遼之意，並遣使齎詔書送善慶歸國，金主對宋使說：『汝歸見皇帝，果欲修好，當早持國書，若仍用詔，則難行也。』

這時候，宋朝童貫蔡京當權，又恃有太宗企圖聯渤海高麗的故事，所以一致贊成聯金攻遼，只有高麗歸來的兩位宋醫和安堯臣言其不可。醫生們引高麗人的話道：『聞天子將與女真夾攻契丹，苟存契丹，猶足爲中國捍邊，女真虎狼，不可近也，宜早爲之備。』這時宋朝苦於不知女真的實情，高麗則與女真爲隣，道其底細。安堯臣的奏疏是有獨出冠時的見解的。他說：『陛下臨御之初，嘗下詔求言，於是謬士效忠，而憸人乃誤陛下，加以詆誣之罪，使陛下負拒諫之謗；故比年天下杜口，以言爲諱。乃者官寺交結權臣，共倡北伐，而宰執以下無一人肯爲陛下言者。臣謂燕雲之役興，則邊釁遂開，官寺之權

重則皇綱不振。……今童貫深結蔡京，同納趙良嗣以為謀主，故建平燕之議。臣恐異時骨亡齒寒，邊境有可乘之釁，狼子蓄銳伺隙，以逞其欲，此臣之所以日夜寒心！伏望思祖宗累積之艱難，杜塞邊隙，務守舊好，無使外夷乘間而窺中國，上以安宗廟，下以慰生靈。……』

徽宗當時聽了未嘗不警心可是童貫蔡京等聯金攻遼，以復幽燕的計劃已經勢在必行的了。宋金信使往返不絕，宣和二年八月，徽宗又遣馬政前往，依照金主的意思，不用詔而用國書，內稱：『大宋皇帝致書於大金皇帝。』金方約定夾攻遼的計劃，金兵自平地松林（今內蒙克什克騰旗地）趨古北口，宋兵自白溝（河名，今直隸易縣東）出發攻幽燕；每年宋納歲幣於金，數額與向來納於遼的相等；並約定毋聽遼講和，旨在必滅契丹。宋這次條約下所得的可能的利益，只是燕雲諸州，而可能的危險則無窮，徽宗朝執政者的昏聵，於此可見了。

以强盜喻女真——其實當時宋朝武事不講，內政窳敗，其力不能攻遼的情形，可以宣和二年宇文虛中的奏疏為證：『臣聞用兵之策，必先計强弱虛實，知彼知己，以圖萬全。今論財用之多寡，指宣撫司所置，便為財用有餘，若沿邊諸郡，帑藏空虛，廩食不繼，則

略而不問。論士卒之强弱，指宣撫司所駐，使言兵甲精銳，若沿邊諸郡，士不練習，武備疏缺，則置而不講。夫邊圍無應敵之具，軍旅無數日之糧，雖孫吳復生，亦未可舉師，是在我者，未有萬全之策也。用兵之道，禦攻者易，攻城者難，守者在內，而攻者在外，在內爲主而常逸，在外爲客而常勞，逸者必安，勞者必危：今宣撫司兵約有六萬，邊鄙可用，不過數千。契丹九大王耶律淳者，智略輻湊，素得士心，國主委任，信而不疑，今欲亟進兵於燕城之下，使契丹自西山以輕兵絕吾糧道，又自營平以重兵壓吾營壘，我之糧道不繼，而耶律淳者激勵衆心，堅城自守，則我亦危殆矣，是在彼者未有必勝之道也。夫在我無萬全之策，在彼亦未可必勝，茲事一舉，乃安危存亡之所繫，可輕議乎？』他接着又言聯金的非計，比較安堯臣更爲透澈。他說：『中國與契丹講和，今踰百年，間有貪惏，不過欲得關南十縣而止耳。間有傲慢，不過對中國使人稍虧禮節而止耳。自女真侵削以來，向慕本朝，一切恭順，今舍恭順之契丹，不封植拯救，爲我藩籬，而遠踰海外，引强悍之女真，以爲隣國，彼既藉百勝之勢，虛喝驕矜，不可以禮義服也，不可以言說喻也，視中國與契丹弩兵不止，鏖戰不解，勝負未決，强弱未分，持卞莊兩鬭之說，引兵踰古北口，撫有悖桀之衆，繫累契丹君臣，雄據朔漢，貪心不止，越逸疆圍，憑陵中夏，以百年怠惰之兵，而當新銳難敵

之虜，以寡謀持重久安閒逸之將，而角逐於血肉之林，巧拙異謀，勇怯異勢，臣恐中國之邊患未有寧息之期也。譬猶富人有黃金之產，與寒士爲隣，欲肆幷吞，以廣其居，乃引强盜而謀曰：「彼之所處，汝居其半，彼之所畜，汝取其全」强盜從之。寒士既亡，雖有萬金之富，日爲切隣强盜所窺，欲一夕高枕安臥，其可得乎？……」

宇文虛中這本奏疏上於宣和四年；安堯臣的奏上於宣和元年，數年之間，宋朝有識之士，對於國際大勢，能夠深切明瞭者漸多，但政府則依然不悟，當時執政者爲蔡童的走狗王黼，讀了宇文的奏議不禁大怒，竟借故加以降職。

初次攻遼的失敗——四年五月童貫及蔡京子攸率師十五萬，巡北邊以呼應金方，分兵二道，种師道趨白溝，爲東路，辛興宗趨范村爲西路，果然將驕卒惰，無紀律，無訓練，竟爲耶律淳部將耶律大石所敗，徽宗懼，下詔班師，遼派人來責備道：『女真之叛，亦南朝所甚惡也。今射一時之利，而棄百年之好，結豺狼之歡，而基他日之禍，謂爲得計可乎？救災卹隣，古今通義，惟大國圖之，』童貫無言可答。

再舉再大敗——同年七月，宋王黼聞耶律淳死，又命童貫蔡攸往攻，以大將劉延慶爲都統制，恰值遼方將領郭藥師以涿易兩州來降，於是宋軍情衆深入，結果又因將無

謀略，軍無紀律，一場大敗，死者不可勝數，積尸百餘里。熙寧元豐以來，數十年積儲的軍實，一朝盡去，所以後來金兵入寇，更能横行無阻了。宋當局的不自量力，輕舉妄動，實為古今歷史上所僅見的。

金的猖獗——這時金方行軍卻非常的順利和迅速。宣和四年正月，金克遼中京大定府（今河北平泉縣東北）；三月克西京大同府，十二月克燕京，於是遼人相率歸降，遼方五京六府，悉為金所得，遼主天祚帝無家可歸，隻身西奔，至應州（今山西應縣）為金將追獲以歸，遼亡。金勝之如此容易，而宋敗得那樣不堪，因此大遭金方蔑視。原來雙方約定以山前山後十七州（即燕雲，所謂山者指太行山）歸宋，於是金主責宋出兵失期，背原約而減為燕京薊景檀順涿易六州，宋使與爭，金不理，且更進一步致書宋朝謂『燕京用本朝兵力攻下，其租稅當輸本朝。』宋不敢抗議。自後金得寸進尺，要求增加歲幣，宋曲意順從，又要求糧食二十萬石，趙良嗣亦口頭允許。宣和五年夏，金以燕京六州歸宋，但各該城市的職官富民，金帛子女，都給金人擄掠北去，只餘一羣老弱和七座空城而已。宋得地後，王黼還率百官表賀，徽宗下詔晉王黼童貫蔡攸等官爵。

宋方背約起釁——宣和六年，降金的遼將張瑴因受金方壓迫，遂來降宋，趙良嗣諫

道：『國家新與金盟，如此必失其歡』但徽宗聽了王黼的話，收納張穀，並且厚加獎勵，封爲平州節度使。不久，金攻下了平州，張穀逃匿於燕京王安中處，金遣人至宋責以收容叛臣，索取張穀甚急，王安中殺了一個貌類張穀的人，將首級送金金識其僞，準備興兵攻燕，宋不得已，命王安中殺穀，將其首級幷其二子送金，於是金方降宋的將士都解體離心，其中降宋最早地位最高的郭藥師向王安中說道：『金人欲穀即與穀，若求藥師亦將與藥師乎？』翌年，郭藥師叛宋降金，助金侵宋，頗爲出力。又同年金人來索取趙良嗣允許的糧食二十萬石，宋譚稹拒而不給，再加其他各種齟齬，於是金責宋納叛背信，遂於宣和七年冬，大舉進攻中國。

宋朝無人——這時金主爲吳乞買，即後來太宗，阿骨打已於宣和五年去世了。領兵入寇中國的元帥爲斡離不，旣無阿骨打之勇，又無金兀朮，粘沒喝之謀略，但宋朝軍事外交兩無人材，金兵乃能勢如破竹，直逼汴京。軍事方面，例如金兵以小舟渡黃河，渡了五日，纔渡完騎兵，步兵猶未登舟，所以金帥笑道：『南朝可謂無人，若以一二千人守河，我豈能飛渡哉！』外交方面，例如宋遣李梲赴金營議和，斡離不盛兵引見，要宋方輸金五百萬，銀五千萬，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鎭地，尊金主爲伯父，並且以宰相爲質。李梲恐怖

喪胆，唯唯不敢措辭。可是宋政府盡力搜括都中金銀，也只得金二十萬、銀四百萬；至於太原等三鎮、又是要塞，這時尚在宋將堅守之下，金方圍攻不克，所以幹離不那種苛刻的要求，也不過是討價而已。宋竟所使非人不敢還價。在這種條件下，和議自然不能成功持久的了。

輿論的激昂——此後徽欽北擄，張邦昌僭立，等等國亡軍敗的情形，皆勢所必然，又爲我人素所熟悉，無須一一贅述。但這裏可以注意一點，即這時國難嚴重，民氣非常的激昂。宣和七年十二月，徽宗內禪，欽宗即位，大學生陳東等上書極諫，請誅蔡京、梁師成、李彥、朱勔、王黼、童貫等六賊，傳首四方，以謝天下。於是數月之間，李彥賜死，王黼、梁師成被殺，蔡京被竄，梁方平、童貫、趙良嗣、蔡攸、朱勔等伏誅。靖康元年二月，欽宗順從金方要求罷綱，陳東又與太學諸生千有餘人上書進諫，請復用李綱。史稱陳東等上書後：『軍民不期而集者數萬人，會邦彥入朝，衆數其罪而罵，且欲毆之，邦彥疾驅得免。吳敏傳宣令退，衆莫肯去，撾壞登聞鼓，喧呼動地，帝恐生變，乃令耿南仲號於衆曰：「已得旨宣綱矣。」內侍朱拱之宣綱稍遲，衆臠而磔之，幷殺內侍數十人。知開封府王時雍麾之不退，帝顧戶部尚書聶昌俾出諭旨，諸生始退。乃復綱右丞，充京城四壁防禦使。既而都人又

言願見种師道，詔促師道入城彈壓，師道乘車而至，衆褰簾視之曰：「果我公也！」相麾聲喏而散。』

『按宋朝立國政策既重尚文士，規定不殺士大夫，所以言論頗爲自由，不過遇著專權的奸臣在朝，則公意無從達於朝廷，人人自危，而公議不張。這時國家危亡，民衆救國自救的心切，輿論自然激昂，民氣自然振作，張邦昌以金人的意思立爲楚帝後，所以要避讓於高宗，也因爲輿論的緣故。但欽宗和隨後高宗都未能善加利用民氣；高宗時奸臣黃潛善汪伯彥當政，竟將上書的陳東歐陽澈斬於東市，復以鼓動羣衆罪加於李綱。復來民氣激昂的時期既過，便漸漸銷沉起來，從外患到內政，從大事到小事，從慷慨到幽默，到南宋亡時，人心也死了。

王夫之評士氣之說曰：『世衰道降有士氣之說也，雖爲倡之，相率以趨而不知戒，於天下無裨也，於風俗無善也，反激以啓禍，於士或死或辱，而辱且甚於死。故以士氣鳴者，士之蠹稗也。所謂士氣者，合衆人之氣以爲氣，嗚呼，豈有合衆氣而得其理者哉。故氣者，用獨者也。使士也以天下爲志，以道義爲行，以輕生死忘貧賤爲守，於是憂國家之危，恤生民之苦，則一與一相當。捐頂踵以爭得失，雖起草茅於九關越

其嘩異，而氣固盈也，乃憂獨之不足以勝，貸於衆以襲義，而矜其君，是先餒也。於己不足而資閑然之氣以興。夫豈有九死不回之義哉。以爲名高，以爲勢盛，宋之多有此也，以爲士氣之昌也，不知其氣之已枵也。諸姦且目笑而視之，如飛鳥之集林。庸主亦厭聞之，如羣蛙之喧夜。則弋國士之名詡清流之黨，即令任之，固不足以拯禍，國家亦何賴有此士哉。政之不綱也，君之不德也，姦之不戢而禍至之無日也不能救而徒大聲以號之，怨詛下逮於編氓。纖跡彰聞於疆敵，羣情搖動而墮其覩上死長之情，則國勢之衰，風俗之薄，實自此貽之，迫至蒙古入杭，羣毆北徙，曾無一人焉，捐此蟪蛄之生，擇乾淨土以爲死所，則鄉之浮氣岔興，山搖川決者。今安往耶。」

秦檜的問題——南宋高宗建炎三年，秦檜與妻王氏從金逃回，揚言有二策可聳動天下，他的二策說起來殊爲可笑，即令河北人還金，中原人還劉豫。（時金人立劉豫爲齊帝，據有山東等地。）秦檜夫婦二人逃回的情形頗爲可疑，因此後世推斷秦檜爲金國的間牒，這實在是一個很有興趣的問題。

若按當時的時勢而論，宋朝以一百五十年積弱的局面而且國亡家破之餘，南渡的小朝廷，正惟恐金方的再來進逼，喘息未定，那裏有北伐的勇氣和力量。將帥方面雖號

稱有張（浚）、韓（世忠）、劉（錡）、岳、還有保蜀的吳玠吳璘，然而真正可靠的只有岳家軍而已。但岳家軍中，岳飛親自訓練出來者少，而招安的羣盜居多，若欲擔這一羣未經訓練的軍隊，又無充實的餉糈輜重，欲圖直搗黃龍，迎回擄帝，事實上不見得可能。（當時諸將、無用的情形，岳飛知之頗審。齊東野語『岳武穆逸事』一節中，載張浚虛驕、輕敵，出師之日，『與高宗約曰：「臣當先驅清道，望陛下六龍夙駕，」約至汴京作上元。飛聞之曰：「相公得非睡語乎？」於是張浚憾之終身。』）

秦檜根據他在金的觀察，知道女真志向不大，以一偏僻的民族，突然崛起，遭遇時會，滅契丹，亡北宋，這時已有饜足之心，所以既立張邦昌，又立劉豫，而並不自據中原。他同時又知道南渡君臣的無能爲，所以深信他的議和策略，必爲雙方歡迎，可以『聳動天下。』出於秦檜意料的，岳飛等武將竟堅決主戰，秦檜起初欲以官爵牢籠諸將，封韓世忠張俊爲樞密使，岳飛爲樞密副使，張俊首先依承秦檜意，韓世忠亦無可無不可，飛獨忠義慷慨，必欲洗雪國恥，所以終不免爲秦檜所害。

高宗時宋金的和議——秦檜的第二策，以河南歸劉豫，也許要使號稱齊帝的劉豫，據黃河以南，爲宋與金之間的緩衝國，但劉豫不久爲金所廢，此策不成，但秦檜既殺岳

飛，宋金的和議卻成功了。和約成於紹興十一年十二月，（一一四一）宋稱臣納貢，條款凡三：（一）畫疆，東以淮水中流為界，西以大散關為界，京西割唐鄧二州，陝西割商秦之半，棄和尚原與方山原；於是宋所有者僅兩浙，兩淮、江東、西、湖南北、四川、福建、廣東西、十五路，京西南路，止有襄陽一府，陝西止有階、成、和、鳳、四州而已。（二）歲幣，宋歲貢銀二十五萬兩，絹二十五萬匹。（三）禮制，宋主受金封冊稱宋帝。

孝宗時的形勢——南宋偏安的局面既成，雖欲收復失地，也是勢所不能的了，這可以孝宗一朝的情形為證。紹興三十二年高宗傳位於孝宗，孝宗天資英武，頗有復國雪恥之心，所以即位後便詔復岳飛官爵，以禮改葬，且下詔臣民直言時政闕失，於是朱熹首先應詔上書，略言：『帝王之學，必先格物致知，以極夫事物之變，使義理所存，纖悉畢照，則自然意誠心正，而可以應天下之事矣；至於修攘之計，不時定者，以講和之說誤之耳。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仇，其不可言和也明甚！願斷以義理之公，參以利害之實，閉關絕約，任賢使能，更相激厲，以圖事功，數年之間，國富兵強，視吾力之強弱，觀彼釁之淺深，徐起而圖之，中原故地，不為我有而將焉往哉？』

這是主張臥薪嘗膽，徐圖恢復的。但真能身體力行如此做去的人畢竟很少。能夠代

表當時苟安的心理的，要推王之望的奏疏，他說道：『人主論兵，與臣下不同，惟奉承天意而已。竊觀天意，南北之形已成，未易相兼，我之不可絕淮而北，猶敵之不可越江而南也。不若移攻戰之力以自守，自守既固，然後隨機制變，擇利而應之。』

宋躁進的失敗——但孝宗血氣方剛，亟圖進取，任用老將張浚，浚實碌碌庸才，輕謀躁進，主張先發制人，乃遣李顯忠出濠州趨靈壁；邵宏淵出泗州趨虹縣。李顯忠饒勇善戰，邵宏淵則懦怯猜忌，兩將不能一致，所以李顯忠起初雖克復靈壁，聲勢頗盛，後來金兵大至，便不得不退，金人追踪而來，至符離（今安徽宿縣）宋師大潰，軍實器械喪失殆盡。後世論者以爲張浚任用邵宏淵不當，所以有這場大敗。這話固然不錯；但實際上宋朝這時力量未充，還沒到收復失地的時機。隨後金帥紇石烈志寧遣書議和，內稱：『乃者出師，詭道襲我靈壁虹縣，以十餘萬竊取二小邑，主將氣盈，率衆直抵符離帥府，以應兵進討，憑仗天威，以全制勝，所殺過當，餘衆潰去，計其得喪，孰多孰少，若以符離之兵尚爲兵少致敗，則請空國之衆，以迎我師。』（齊東卷二）語雖不無誇張，也可看出宋金勢力的不敵，和這時用兵恢復的錯誤。

魏杞的外交——但孝宗朝的外交，卻比較軍事來得順利。隆興二年，孝宗遣宗正少

卿魏杞赴金議和約，書稱『姪大宋皇帝某再拜奉書叔大金皇帝』不復用君臣稱謂，歲幣則減為二十萬。孝宗面諭杞道：『今遣卿北使，一、正名；二、退師；三、減歲幣；四、不發遣歸附人，必許我四事，而後可允和耳。』魏杞臨行奏道：『臣將命出疆，豈敢不勉，萬一虜情無厭，望勿以臣故而緩進兵』魏杞至燕山，金人以國書稱大宋，通杞除去『大』字，杞堅決拒絕，說宋朝『天子神武，才傑奮起，人人有敵愾之志，北朝用兵，能保必勝乎？』金君臣聞言心折，於是命紇石烈志寧罷兵，允許減少歲幣，不發遣歸附人，魏杞出使的四項任務完全達到目的，從此宋金進為對等國家。

寧宗時躁進的再失敗——這次的和平維持了三十餘年，直到寧宗時韓侂冑北伐時方纔打破。韓侂冑當時獨攬大權，意圖立功自固，於是追封岳飛為鄂王，定議伐金。按這時金方原有積弱之勢，宋如能勤修武事，相機而動，正可以湔雪國恥，還我河山，但韓侂冑與張浚一樣的輕躁寡謀，結果也一樣的失敗。計開禧二年（一二〇六）宋將郭倪敗於宿州，皇甫斌潰於唐州，王大節攻蔡州不克，秦世輔軍亂於城固縣，幾成一面倒之勢，於是金人分九道南侵，連陷江淮荊襄諸州，北伐未成，南宋的根本反而動搖起來。宋方事急心慌，於是史彌遠等設計誅韓侂冑，斬韓氏首級送金求和，於是寧宗嘉定元

年（一二〇八）和議成功，規定歲幣增加為三十萬另外給予犒軍錢三百萬緡，同時金人亦以侵佔各地歸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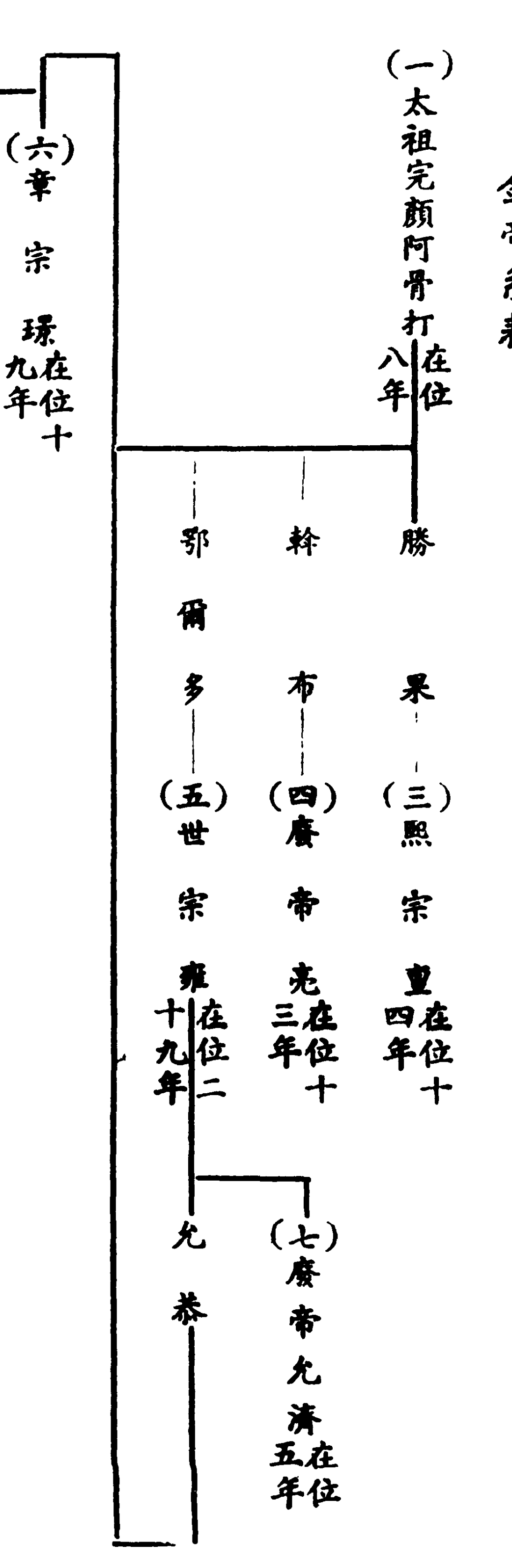
按宋金雙方前後共訂立五次和約其大概情形如下表：

| 時代 | 地位 | 歲幣數目 | 兩國疆界 |
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
| 徽宗 | 宋金平等 | 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 | 以河北省燕京一帶爲限 |
| 欽宗 | 宋姪金伯 | 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 | 於太原等三鎮讓金 |
| 高宗 | 宋臣金君 | 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 | 以淮水大散關等處爲界 |
| 孝宗 | 宋姪金伯 | 銀二十萬兩絹二十萬匹 | 如前約 |
| 寧宗 | 宋姪金伯 | 銀三十兩絹三十萬匹 | 如前約 |

這最後一份條約訂定時，蒙古成吉斯汗已經應運崛起，自後的宋金關係進而為宋

金蒙古的三角關係，二十六年後（一二三四）金亡於蒙古。國祚共歷一百二十年。

金帝系表




## 第四節 蒙古

蒙古始興——蒙古乃十三世紀崛起中國北方大漠，橫行歐亞二洲的強大勢力，其民族大英雄爲成吉斯汗鐵木真，他的豐功偉蹟，屬於整個的世界歷史。但因爲蒙古當

初文化幼稚的關係，我人對於鐵木真先世的事蹟，幾乎只有渺茫的傳說可憑。據元史太祖本紀所載，大概蒙古先世有一個孛端又安，狀貌奇異，才能卓越，子孫蕃衍，各成部落，居於烏桓（東胡別種，居今嫩江北部）之北，世奉貢於遼金，向被認爲韃靼民族的支派，傳了九世，至也速該，併合諸部，勢漸强大，生子有異徵，定名鐵木真。也速該死，其部衆多歸族人泰赤烏，鐵木真與其母月倫，率部下爲十三翼，與泰赤烏大戰獲勝，於是泰赤烏部下相率來歸。當時乃蠻（居今外蒙古西部）部强盛，與鐵木真比隣，時時加以侵掠，鐵木真乃大會屬部拒戰，擒乃蠻部長太陽罕，諸部皆降，聲勢愈大，於是鐵木真會合諸部長於斡難河（即今黑龍江上流）的發源地，建白旗九斿，自稱成吉斯汗，這時正是宋寧宗開禧二年，金章宗泰和六年（一二〇六）。

成吉斯汗的武功——鐵木真自斡難河建國稱汗以後，鐵騎四出，征伐各地，西夏諸國，望風而服，又大舉侵金，奪其河北山東地，於是親自引兵西征，首滅西遼，次滅花剌子模，其餘衆走入印度，蒙古兵追擊破之，屠殺了一百六十萬餘人。這時成吉斯汗部下哲伯和速不台兩員勇將，復由裏海南經高加索山，破欽察部，長驅直入俄羅斯，陷其首府基輔，蕩爲平地，再越過喀爾巴阡山脈，與歐洲諸侯戰，又獲大勝，殺人如麻，全歐之民皆

驚駭莫名，蒙古人後來留在俄羅斯，做了二百年的主宰。成吉斯汗凱旋東歸，順道滅西夏，並計劃再舉伐金，至六盤山病歿。(一二二七)

宋金蒙古最初形勢——真德秀請停金歲幣——蒙古既奪去了金的河北山東地，金國感受蒙古的大威脅，認爲中都(即今北平，金稱中都大興府)不易扼守，於是宣宗遷都於汴(一二一四)。自後蒙古小隊人馬，曾屢次侵金。金尚能自守。這時南宋方面，聽到了蒙古崛起和金室南遷的消息，全國上下的第一個反應是以爲報仇雪恥的機會來了。真德秀上書請停解歲幣，同時力陳宋應亟圖自立，說道：『女真以韃靼侵凌，徙巢於汴，此吾國之至憂也；蓋韃靼之圖滅女真，猶獵師之志在得鹿，鹿之所走，獵必從之。旣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，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？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，則疆場相望，便爲鄰國，固非我之利也；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卽安中土，則奸雄必將投隙而取之，尤非我之福也！今當乘虜之將亡，亟圖自立之謀，不可幸虜之未亡，姑爲自安之計也。夫用忠賢，修政事，屈羣策，收衆心者，自立之本；訓兵戎，擇將帥，繕城市，飭戍守者，自立之具。若以忍恥和戎爲福，以息兵忘戰爲常，積安邊之金繒，飾行人之玉帛，女真尚存，則用之女真，強敵更生，則施之強敵，此苟安之計也。陛下不以自立爲規

模，則國勢日削，人心日偷，雖弱虜僅存，不能無外憂，蓋安危存亡，皆所自取，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，而召之以可侮之形，是堂上召兵，戶內延敵也。……』

德秀的見解——真德秀為南宋有數的名臣，這時姦相史彌遠當政，能夠關心國事者甚少，德秀這本奏議，對於國勢形勢，瞭如指掌，眼光相當的遠大。他以為（一）金為宋不共戴天之仇，故應聽其自行滅亡，而巨額的歲幣正可以從此停解；（二）但韃靼（蒙古）假如滅金，對於宋也有極大危險；所以（三）宋應該整軍經武，亟圖自立，不可以苟安為計，準備以向來事金之道，移事蒙古。他的這種見解，在他翌年（嘉定八年）十一月再上的奏疏裏，反覆說明，益加清楚，茲不具錄。

批判——然而我人根據後來的經過事實，來看真德秀這些奏疏，覺得他想得還不透澈。第一、他狃於宋金世仇的成見，不知這時金存可為宋的屏障；第二、他沒有仔細想到自立這句話，談何容易，以宋當時『羣臣盤樂怠傲，乃有宣和之習。東南民力，耗於軍餉者十八，而士卒窮悴，嘗有不飽之嗟；災異頻仍，修省之實未覩，言論壅塞，讜直之士弗容。……蒙蔽之風日熾，聚歛之政日滋，』（用真德秀第二次奏疏中語）可見自立這話一時談不到，那末金亡後與韃靼為隣，宋將何以對付它們的侵略？最後，因為他對於

宋金世仇的概念，和發奮自立的理想，所以他主張立即停解歲幣；殊不知單方面背約，難免引起戰爭，而宋金衝突，兩敗俱傷，恰爲蒙古收『獵師』之利，像後來的事實便是如此。我人因爲真氏代表他那時候最前進的輿論，歲幣的停解又直接影響於宋金蒙古三方面的和戰關係，所以特別提出來加以申論。

宋金的鷸蚌相爭——自從嘉定九年起至理宗紹定五年止，約十六年間，蒙古差不多退出了中國的戰場，從事於西方的長征，和長征後的休息。對於金，宋和西夏，這真是一個暴風雨將至的前夜，滅亡已經注定在不遠的將來。但愚昧的金國君臣，首啓兵端，於嘉定十年，入寇宋的襄陽棗陽等處，宋以孟宗政趙方等爲帥，雙方互有勝敗。到了十一年十二月，金主遣使請和，宋拒而不納，於是繼續構兵數年，其間西夏也加入了戰渦，與宋夾攻殘金。但大家都不能怎樣得利，徒然銷耗國力而已。直到嘉定十六年金主宣宗崩，未幾宋寧宗亦崩，翌年金哀宗守緒即位，乃遣使至宋議和，結束了這場自殺的戰爭。

宋聯蒙古伐金，再蹈宣和覆轍——據云成吉斯汗臨終的時候，遺囑諸將道：『金精兵皆在潼關，南據連山，北限大河，難以遽破，不若假道於宋，宋金世仇，必能許我。如是則

兵下唐鄧，直擣大梁（即汴）金急，必徵潼關之兵以自救，然數萬之衆，千里赴援，人馬疲弊，雖至亦弗能一戰，破之必矣。』到了紹定四年七月蒙古主窩爾台遣使速不罕來宋，求借道淮東，以攻河南，並請宋出師會攻金汴都。速不罕行至沔州，宋統制張宣，未得政府命令，擅自執殺速不罕。於是蒙古大怒，使拖雷引兵入大散關，陷鳳州，興元，進破饒鳳關（皆在陝西，）宋室大震。隨後蒙古兵便自陝西的漢水而東，大破金兵三峯山下，遂克均州（今河南均縣，）金健將陳和尚，哈達，楊沃衍等皆死，金的健將銳卒，一時俱盡，更無能力抵抗蒙古了。同時窩爾台渡河而南，進圍汴都；但又恐汴都一時難克，紹定五年十一月，再度遣使王檝來宋，與史嵩之議夾攻金，史嵩之報告政府，宋羣臣大多以爲正可乘勢滅金，藉雪國恥，趙范反對道：『宣和海上之盟，迄以取禍，不可不鑒。』理宗不聽，命史嵩之報使蒙古，許助兵夾攻，蒙古亦允許滅金後以河南地歸宋。於是史嵩之派了大將孟珙，領兵會合蒙古伐金，孟珙善用兵，頗獲勝利。

金的忠告——紹定六年九月，金哀宗遣完顏阿虎帶來宋乞糧，吩咐他說：『宋人負朕深矣，朕自即位以來，戒飭邊將無犯南界，邊臣有請征討者，未嘗不切責之。向得宋一州，隨即付與；近淮陰來歸，彼多以金帛來贖，朕若受財，是貨之也。付之全城，秋毫無犯，清

口臨陣，生獲數千人，悉皆資糧遣之。今乘我疲敝據我壽州，誘我鄧州，又攻我唐州，彼爲謀亦淺矣，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；夏亡及於我；我亡必及於宋。唇亡齒寒，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，所以爲我者，亦爲彼也。卿其以此意曉之。』阿虎帶至，宋朝議拒絕不納。金哀宗的懇切的忠告，已不能勸醒宋朝滅金的決心了。這時宋君臣上下，所以不顧利害，要與蒙古連兵伐金，無非狃於宋寧宗詔書所謂『豈不知機會可乘，雠恥未雪』這句話。

金的滅亡——金自三峯山的大敗後，勢已窮蹙，哀宗守睢因汴京被圍之後，糧盡援絕，又遭大疫，死亡枕藉，因此棄汴而走歸德，於是汴都爲蒙古所得，金后妃宮嬪，宗室男女五百餘人，爲蒙古或殺或囚，其悽慘的情形，過於徽欽被擄的時節。到了紹定六年夏，金哀宗又自歸德奔蔡州。散兵潰衆，稍稍復聚。同年冬十月，蒙古帥塔察爾率兵來圍，宋孟珙及副將江海，又率兵二萬運米三十萬石，前來赴約攻蔡。到了翌年正月，蔡州城中已斷糧三月，遂被攻破，金主自縊死，金亡。

宋的不自量力違背盟約——宋與蒙古滅金後，依條約規定；河南歸宋，陳蔡西北歸蒙古，但端平元年夏（這時距金哀宗之死不及半載）宋趙范趙葵兄弟二人忽又野

心動發，主張乘機撫定中原，建議守黃河，據潼關，收復汴，（開封）洛陽，應天府（河南，商丘縣）三京。他們的理由因三京爲宋歷代皇帝陵寢所在，且守河據關則對蒙古的邊防可以鞏固。但他們沒有想到宋與蒙古勢力懸殊，一旦背盟啓畔，將有何等的危險。

當時宋臣反對這個建議的很多，反對的理由很充實，例如喬行簡舉出三點『……夫自古英君，必先治內而後治外，陛下視今日之內治，其已舉乎？其未舉乎？……紀綱法度，多頹弛而未張；賞刑號令，皆玩視而不肅，此皆陛下國內之臣子，猶令之而未從，作之而不用，乃欲闔闢乾坤，混一區宇，制奸雄而折戎狄，其能盡如吾意乎？此臣之所憂者一也！……數十年來，上下皆懷利以相接，而不知有所謂義，民方憾於守令，緩急豈有效死勿去之人，卒不愛其將校，臨陣豈有奮勇直前之士，蓄怨含忿，積於平日，見難則避，遇敵則奔，惟利是顧，遑恤其他，人心如此，陛下曾未有以轉移固結之，遽欲驅之向北，從事於鋒鏑，忠義之心，何由而發？況乎境內之民，困於州縣之貪刻，阨於勢家之兼併，飢寒之氓，常欲乘時而報怨，茶鹽之寇，嘗欲伺間而竊發，蕭牆之憂，凜未可保，萬一兵興於外，纏於強敵而不得休，潰池赤子，復有如江閩東浙之事，其將柰何？……此臣之所憂者二也！……自古英君規恢進取，必須選將練兵，豐財足食，然後舉事。今邊面遼闊，出師非止一途，陛

下之將，足當一面者幾人？非屈指得二三十輩，恐不足以備驅馳。陛下之兵，能戰者幾萬？分道而趨京洛者幾萬，留屯而守淮襄者幾萬，非按籍得二三十萬衆，恐不足以事進取，……臣實未知錢糧之所從出也。興師十萬，日費千金，千里餽餉，士有飢色，今之餽運，累日不已，至於累月，累月不已，至於累歲，不知累幾千金而後可以供軍費也。今百姓多垂罄之室，州縣多赤立之帑，大軍一動，厥費多端，其將何以給之？……兵事未已，欲中輟則棄前功，欲勉强則無多力，國既不足，民亦不堪，臣恐北方未可圖，而南方已騷動矣。……他日糧運不繼，進退不能，必勞聖慮，此臣之所憂者三也！」

恢復三京的失敗——當時鄭淸之爲相，贊成趙氏兄弟的建議，力排衆人的反對，端平元年六月理宗下詔收復三京。於是趙葵全子才等輕師銳進，六月入汴都，金遺臣李伯淵等殺蒙古守將崔立以降；七月入洛陽，初以爲一座空城，但後面蒙古兵已追踵南下，宋師大潰；九月，趙范便以入洛失敗報告朝廷。十二月蒙古使臣王檝來責宋，何故敗盟。宋派程芾爲通好使報聘請盟，竟不得要領而歸。於是對外則已啓釁蒙古，對內則襄陽淮蜀各地內亂紛起，許多金方降將如李伯淵等又叛降蒙。

元宋的興替——宋理宗在位四十年，度宗在位十年，任用的大臣均不得其人，先則

史彌遠，繼而丁大全，終而賈似道，始終為賄賂苞苴的亡國政治。這時蒙古太宗窩闊台之後，繼以定宗憲宗均無重大關德，而且賢臣如耶律楚材等執政，立法創制，漸有文化。憲宗又以南方的機宜委於其弟忽必烈。忽必烈任用漢人儒士如姚樞許衡等，漸漸收到中原的人心，到後來宋將劉整等投降蒙古後，忽必烈更深知南宋的虛實情形了。

蒙古侵宋……—自端平二年起宋與蒙古的盟約既已破壞，蒙古的宗室將帥於是紛紛貪功南侵，因係小隊人馬，勢力分散，故宋不孟珙等尚能竭力對付。這時蒙古政府無意大舉入寇，曾遣王檝屢次來宋議和，但南宋朝庭多疑寡斷，不能與蒙古議訂永久的和約，王檝前後五次至宋，終以議和未成，隱憂成疾，於理宗嘉熙四年死於宋。翌年，即淳祐元年十二月，蒙古又遣月裏麻思來議和從和者七十餘人，行抵淮上，宋守將脅令拘降，月裏麻思不從，竟為宋將因於長沙飛虎寨。蒙古議和的好意，既一再被宋朝拒絕，雙方邊界的衝突遂無寧息，到了理宗寶祐四年（一二五六）蒙古憲宗積怒爆發，於是親自伐宋，分三道並進：一軍由洋州趨米倉（均在陝西），一軍由潼關趨沔州，憲宗自將大軍自劍門入閬州，又令阿裏海涯自雲南貴州方面，由南而北，破橫山，蹴賓州，進掠辰沅，直抵潭州（長沙），宋勢十分危急

賈似道欺君瞞國——當時王堅力守合州（四川合川縣，其城極堅，為宋余玠入蜀後所築，）憲宗自率精兵圍攻不下，恰值軍中發生大疫，憲宗竟於南宋開慶元年（一二五九）染疾而死。這時忽必烈的軍隊已渡淮而南，由大勝關至黃陂（在湖北，）聞憲宗凶耗，因大功未成，置之不顧，竟渡長江而圍鄂州，（今武昌。）聲勢洶洶，中外大震，理宗命賈似道為荊湖宣撫大使，率兵援鄂，至黃州，密遣宋京詣蒙古營乞和請稱臣納幣，畫割江北地，歲奉銀絹各二十萬，忽必烈恐其少弟阿里不哥自立於北方，因此允許宋方和議；引兵北去，此外阿里海涯等亦解圍而去。賈似道將遣使請和事隱匿不報，反遣兵殺蒙古殿後的隊伍一百七十餘人，以大捷聞於朝廷。理宗大喜，以為似道有再造宋室之功，加少師，封衛國公。

宋的自召滅亡——忽必烈北歸即位，改元中統，是為元世祖。世祖起初也想休兵息民，派翰林侍讀學士郝經來告即位，並且修訂上次鄂州的和議。賈似道恐議和條件洩漏，而受欺君瞞國的處分，竟將郝經拘留於真州（今江蘇儀徵）的忠勇軍營。蒙古因國內有事，暫時未來查問，賈似道依然在西湖上荒唐淫佚，不知覆亡便在眼前。咸淳四年，蒙古便遣兵圍攻南宋當時的重鎮襄陽和樊城，賈似道始終頓兵不救，圍了六年，樊城

陷，襄陽亦隨之而破。

度宗咸淳十年，元（蒙古于咸淳七年建國號為元）丞相伯顏大舉伐宋，抱有平定江南的決心。論這時宋元的勢力，則元方為有訓練、有紀律的勁卒，在大將兼名臣伯顏指揮之下，號令嚴肅，進退如一，軍器則有歐洲國家傳來的礮術，再加明君在上，賢臣在朝至於宋的方面，度宗既以憂死，幼主恭帝在位，人心瓦解，兵將懦弱，武備不充，所以宋全成為一面倒之勢，只為南宋有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三人的誓死奮鬬到底，陸張又奉了端宗帝昺播遷閩廣。因此南宋的滅亡比了金與夏的滅亡似乎較為熱鬧多了。

宋代帝號及年號一覽表（兩宋享國三百十七年）

| 帝號 | 在位年數 | 西曆紀元 | 年號 |
|---|---|---|---|
| (一)太祖 | 十六年 | 九六〇—九七五 | 稱建隆者三年，乾德五年，開寶八年。 |
| (二)太宗 | 二二年 | 九七六—九九七 | 太平興國八年，雍熙四年，端拱二年，淳化五年，至道三年。 |
| (三)真宗 | 二五年 | 九九八—一〇二二 | 咸平六年，景德四年，大中祥符九年，天禧五年，建興一年。 |
| (四)仁宗 | 四一年 | 一〇二三—一〇六三 | 天聖九年，明道二年，景祐四年，寶元二年，康定一年，慶曆八年，皇祐五年，至和二年，嘉祐八年。 |

| | | | |
|---|---|---|---|
| (五)英宗 | 四年 | 一〇六四—一〇六七 | 治平四年。 |
| (六)神宗 | 一八年 | 一〇六八—一〇八五 | 熙寧十年，元豐八年。 |
| (七)哲宗 | 一五年 | 一〇八六—一一〇〇 | 元祐八年，紹聖四年，元符三年。 |
| (八)徽宗 | 二五年 | 一一〇一—一一二五 | 建中靖國一年，崇寧五年，大觀四年，政和七年，重和一年，宣和七年。 |
| (九)欽宗 | 一年 | 一一二六—一一二六 | 靖康一年。 |
| (十)高宗 | 三六年 | 一一二七—一一六二 | 建炎四年，紹興三十二年。 |
| (十一)孝宗 | 二七年 | 一一六三—一一八九 | 隆興二年，乾道九年，淳熙十六年。 |
| (十二)光宗 | 五年 | 一一九〇—一一九四 | 紹熙五年。 |
| (十三)寧宗 | 三〇年 | 一一九五—一二二四 | 慶元六年，嘉泰四年，開禧三年，嘉定十七年。 |
| (十四)理宗 | 四〇年 | 一二二五—一二六四 | 寶慶三年，紹定六年，端平三年，嘉熙四年，淳祐十二年，寶祐六年，開慶一年，景定五年。 |
| (十五)度宗 | 一〇年 | 一二六五—一二七四 | 咸淳十年。 |
| (十六)恭帝 端宗 帝昺 | 二年 | 一二七五—一二七六 | 德祐二年。 |

# 第四章　代表人物

在宋代這一種傳統的國策之下，如何能談軍事，在這一羣朋黨的輿論之下，如何可言外交？我人在數百年後的今日，立於客觀地位，來攷究興亡得失，似乎都是洞若觀火，都能替宋朝立一個安內攘外的政綱，但在當時設身處地著想，恐怕也不過留幾篇文章爲後人誦讀而已。所以我人對於當時獨具隻眼，識見明確而能身體力行的兩位人物，特別要提出使讀者注意，第一個是想根本改造社會國家積弱的局面的王安石，他的積極的攻勢的態度，總是值得讚美的。第二個是想挽回宋末不可挽回的局面的文天祥，他是所謂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，』他的自處的守勢的態度，也是值得我人師法的。這兩位都是但計國家的將來福利，而不問個人的利害得失的。反之，不問民族的前途如何，而但求個人目前的富貴榮華者，我人也可以舉出兩個代表人物，一個是童貫，居然借外力收復失地晉封王爵，可謂極功名之盛；一個是賈似道，深得皇帝信任，占領湖山，半閒堂鬪了二十年蟋蟀，可謂極富貴之能。雖然以他們當時農業經濟下簡陋的歡娛，來比今日工業文明下物質的享受，不免有小巫見大巫之誚；但他們那種個人

享樂主義，和以游戲人間的態度來辦理的外交大政確是特別值得紀錄的。

這裏我們並不列入岳飛與秦檜，因為他們是那過度時期天然的產物。北宋的亡，金與南宋的成立，必經千百年的大小原因的結晶。縱無秦檜也有人主和，縱無岳侯也有人能[illegible]聽 李鴻章於甲午之後寫信與他的同門俞曲園，說人家罵他是秦檜；俞老先生覆他說「秦檜可做，岳飛不可做。」的確是讀史有得之言。秦檜的惡，對內甚於對外。但是他們總是時勢造成的。只有現在舉出的四個人，或則非常的賢聖，或則十分的奸頑，實在是獨特地立出在宋朝歷史上的，所以本書為他們特闢專章。

## 第一節 王安石

王安石的生平——王安石臨川人，（今江西臨川縣）生於宋真宗天禧五年（西歷一〇二一）仁宗慶曆二年，他二十二歲，中進士試第四名，自後歷官淮南，鄞縣、舒州、常州等處。這時期他的政治經濟思想，經過實地行政的經驗，已漸漸地成熟，嘉祐三年，他就上書仁宗暢言時弊，這時他三十八歲，但仁宗不能用，直到十年之後，神宗即位，慕名求賢，命他越次入對，熙寧二年便付托他以實際的政權，他從此秉政約有十載，元豐

二年、他五十九歲，遂退居南京鍾山，哲宗元祐元年逝世，享壽六十有六。

當時財政的困難——當安石上書仁宗的時候，國家當前的問題，便是財政困難與兵制窳敗，二者而且又有互相因果的關係。財政方面，自從宋太祖設置轉運使，把諸路的粟帛錢幣集中於京畿，財政使歸統一，太祖太宗都是輕賦薄斂，同時又撙節用度，所以國家收支無甚問題，但是也沒有興辦任何建設事宜，（如農田水利等）真宗景德以後，每年要以巨額歲幣賂遺契丹，到了大中祥符時期，又因天書封祀，國家歲出有加，而開源之道未曾講求，仁宗時候契丹歲幣增加，西夏又要年賜巨款，再加對西夏交趾的用兵，財力便漸漸匱乏不給，同時國內方面，釋道僧尼和遊手好閒之輩，數目亦有可驚的增加，在賤商重農的經濟制度之下，而生之者寡，食之者衆，水旱的天災時時間作，兵備賂遺的費用年年無減，平常的時候已經拮据得很，變故發生又將怎樣？這是具有實際眼光的政治家所引為企憂，而為反對言利的宋儒士夫所鄙而不談的。

兵制的窳敗——其次說到當時的兵制。宋初兵額分四種，叫做禁兵，廂兵、鄉兵、與蕃兵。鄉兵是一種民兵，與現在民團同一功用，只能用以防守當地，而不能用以捍衛國家。實際擔任邊防作戰、更戍各路的便是禁兵。至於廂軍，乃諸州的鎮兵，蕃兵乃西北邊塞

內附的部落都不能算是正式的國防軍。宋的兵制是募兵制度，募兵的方法有好幾種，募得的新兵，矯健者撥入禁軍，短弱者撥入廂軍，禁軍和廂軍都是食俸廩，養妻子，總計全國廂禁諸軍的俸廩年需緡錢百萬以上，為國家常年支出中最大的一項。在仁宗時候，西夏用兵緊張，因此添募了許多兵，但將驕士惰，徒耗國用，這種募兵制的窳敗情形，當時言者頗多，可引歐陽修的話為代表。他說：

「國家自景德罷兵，三十三歲矣。兵嘗經用者，老死幾盡；而後來者，未嘗聞金鼓，識戰陣也。生之於無事，而飽於衣食也，其勢不得不驕惰。今衛士入宿，不自持被，而使人持之。禁兵給糧不自荷，而僱人荷之。其驕如此，況肯冒辛苦以戰鬬乎？」

又說：「今廂禁之軍，有司不敢役；必不得已而暫用之，則謂之借倩。彼兵亦相謂曰：「官倩我」而官之文符亦曰：「倩。」夫賞者所以酬勞也。今以大禮之故，不勞之賞，三年而一徧，所費八九十萬，有司不敢緩日月之期。兵之得賞，不以無功知愧，乃稱多量少，比好嫌惡，少不如意，則持梃而呼，羣聚欲擊天子之命吏。無事之時猶若此，以此知兵驕也。……今宋之為宋，八十年矣。……兵不足以威於外，而敢驕於內。制度不可為萬世法，而日益叢雜，一切苟且，不異五代之時，甚可歎也。」

安石的愛國——這種粉飾太平的局面所蘊有的危機，安石都是洞若觀火，可以他的上仁宗書，和後來上神宗的奏議中的警語為證：

『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，風俗日以衰壞……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為公患也，患在治財無其道耳！在位之人才既不足，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，社稷之托，封疆之守，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，而無一旦之憂乎？願監苟且因循之弊，明詔大臣，為之以漸，期合於當世之變。』（上仁宗萬言書）

『農民壞於繇役，而未嘗特見救恤，又不爲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。兵士雜於疲老，而未嘗申勅訓練，又不為擇將而久其疆場之權。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，而未有以變五代羈縻之俗。……其於理財，大抵無法，故雖儉約而民不富，雖憂勤而國不強，賴非夷狄昌熾之時，又無堯湯水旱之變，故天下無事，過於百年，雖曰人事，亦天助也。……伏維陛下……知天助之不可常恃，知人事之不可終怠，則大有爲之時，正在今日。』（上神宗奏）

北宋的挽救機會——兩份奏疏相去十餘年而安石始終言之諄諄，其救當世之弊，防將來之變，彷彿對於靖康的慘禍，已有十分的先見。恰巧遇到英明的神宗也一樣的

萬目時艱，有富國强兵之志，所以他初即位時便對文彥博說道：『養兵備邊，府庫不可不豐。』當時人才滿朝，而神宗獨屬意安石，委以大權，傾心不疑，君臣相得；於是中國陰沉已久的天空上，頓湧現了希望的光明，而大宋將傾的華廈，也得到了挽救的機會。

兩個實際問題——我人若從研究中國的政治與經濟思想出發，而把王安石的新法看做一種思潮，他無疑是一個大思想家，他的新法自有其永久的價值；但從研究『宋之外交』的出發點把新法看做一種以富國强兵為目標的政策，那末我人必須拋開一切時代的偏見，而設法解答這兩個實際的問題：『新法在當時的成效如何？新法能否制止北宋的覆亡？』

新法實行上的困難——按新法的範圍甚廣，其中主要的青苗，均輸、免役、市易、農田水利，方田諸法，差不多牽涉全部的國民經濟；其他如保甲保馬二法，次之如更戍法的改革，再次如武學的設立，是旨在逐漸改革全部的軍政的；最後關於學制的改革，是旨在造就比較切實的才具的。我人現在要推論新法在當世的成效，真是茲事體大，不容遽下斷語；而且我人取材所自的宋史，一則內容蕪雜，二則對於安石有偏見，更使我人對於新法成效這個問題，不能在八百餘年之後，達到切實的答覆。但是從當時的時勢，

和中國夙昔的傳統而言，新法實蒙受極大的困難，這種困難在今日的我人，可說還是很熟悉的。約略言之：(一)數千年尊孔崇儒的教化，絕不能容納安石的『法治』與『言利』所以古今儒家中最聰明正直的政治家司馬光，當然地做了反對黨的領袖。(二)封建的與農業的經濟制度之下，民衆具有强烈的保守因循之心，所謂『可與守成，不可與圖始。』這是新法所遭民衆心理上的大妨礙。(三)青苗募役市易均輸各法莫不侵犯到士紳，土豪，富商等的利益，他們便做了新法的階級敵人。(四)新法具有國家資本主義的雛型，超前了當時的經濟階段，因此新法成功上必要的若干先決條件似乎並未完備。(五)執行新法的公務人員，既無經驗，又未受任何訓練，因此新法實行的技術上有許多缺點。(六)此種國家大政至少得要二三十年的繼續不斷的努力才能奏效，有如現在俄國的五年計畫一樣。

王安石的苦衷——根據這幾點考慮，我人已可以推論到新法在當時至少是不會成效卓著的。至於普通認爲新法的失敗由於安石任用非人，和操切用事，我人以爲這未免是舍本逐末之談。要知新法既爲當時輿論權威的士大夫階級所猛烈反對，再加宋代本來缺乏實際經世的幹才，那末安石要去找尋相當數目的適當人材，自然是等

於不可能的一件事。至於所謂『操切用事，』這倒很可研究。『操切』也者，無非指新法施行太驟，太急、在一時之間，舉辦許多新政，似乎是不量力而輕進。但我人知道王安石是孤立的，雖有信任極專的皇帝做後盾，卻有太后、后妃、宗室、儒士大夫做敵人；同時人生的壽命既很短促，（王秉政時已四十八歲）君臣的知遇也不永久；他的新法又是一貫的富國強兵的計劃。在這各種考慮之下，王安石欲求他的抱負可以展開，理想可以實現，不致與人俱亡，半途而廢，惟有以極大的魄力，最高可能的速度，來實行他全部的計劃，但望成效早早顯著，可以藉悠悠之口，消除無知的反對，而獲識者的同情，這樣一來，或許反有終底於成的希望。所以不知者謂之『操切，』知之者許其苦心。

另一個問題『新法能否制止北宋的覆亡？』

歷史的事實如此：神宗既崩，哲宗即位，高太后臨朝，司馬光爲相，於是首罷保甲法，繼而方田，市易、保馬、青苗、免役諸法一概廢除，這樣經過九年之久，於是章惇蔡卞諸新黨執政，悉行恢復新法，但他們是借新法的名義以爲對於舊黨報仇雪恨的努力，後來蔡京繼續當國，更借了紹述神宗的美名以專權誤國；計安石元豐致仕退隱鐘山後，約四

十六年而靖康之難發作。

保甲法效力問題——按金的崛起，遼的滅，北宋的亡，前後不過十五年，真是時代的突變；假定在那四十六年中間，安石的新法果能順利進行，自必有相當的效果；那末即使徽宗浪費無度，青苗市易等經濟政策所積蓄的國富，被他揮霍殆盡，但保甲法推行既久，造成一種通國皆兵的局面，金人那能任意橫行中原，而不遭中國的强力抵抗呢？

保甲法的內容——保甲法內容大概如次：『十家爲一保，選主戶有幹力者一人爲保長；五十家爲一大保，選一人爲大保長；十大保爲一都保，選爲衆所服者爲都保正，又以一人爲之副。主客戶兩丁以上，選一人爲保丁，附保兩丁以上，有餘丁而壯勇者亦附之。內家貲最厚材勇過人者，亦充保丁。逃移死絕，致同保不及五家，併他保。有自外入者收爲同保，戶數俟及十家，則別爲保。兵器非禁者，聽習。每一大保，夜輪五人警盜，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。……保甲之法，初試行於畿甸，既就緒，遂推於永興秦鳳河北東西五路，以徧於天下。』

宗旨——保甲完全是要逐漸改革募兵制度的一種企圖。當施行之初，其功用不嘗

今日的警察，但隨後詔令續下，增加軍事訓練的程度，並且還有校閱的規定。在安石立法的本意確是要練成精強的民兵來代替糜餉窳敗的募兵，所以他說：『俟保甲習熟後，可代正軍上番。東兵技藝亦弗能優於義勇保甲。』又說：『今爲募兵者，大抵皆偷惰頑猾不能自振之人；爲農者，皆樸力一心聽令之人，則緩急莫如民兵可用。』又說：『臣願早訓練民兵，民兵成，則募兵當改矣。』

據宋史紀事本末所載，（卷三十七，第二十九頁）當時諸州推行保甲法後『禁令苛急，往往去爲盜，郡縣不敢以聞。判大名府王拱辰抗言其害曰：「非止困其財力，奪其農時，是以法驅之使陷於罪罟也，浸淫爲大盜，其兆已見，縱未能盡罷，願裁損下戶以紓之。」……抗章不已，帝悟，由是下戶得免。』

保甲法的討論——這段文學，不盡不實，無庸深究，不過其中說到造成大盜一點，卻可發人深省，假定新法竟能像安石的志願那樣一一實現，富國強兵的功效完全達到。然而遇到無道的君臣，如秦始皇以後有二世趙高，宋神宗以後有徽宗蔡京童貫，那末富國政策的收獲，徒然促進他們的驕奢淫佚之心，而強兵政策像王安石的保甲法，製造了全國數百萬的民兵，家家都有弓箭武器，州縣都有團結訓練，那末政府無道的結

果，小則驅民爲盜，大則擧國叛亂。（徽宗朝內亂甚多，著者如方臘造反，聚衆二三十萬，又史稱宋江以三十六人、橫行河朔，轉掠十郡。）所以安石的保甲法假如圓滿實行，達到以『民兵代募兵』的始意，而遇到徽宗童蔡當國，則北宋不致亡於金，而必然要亡於內亂。

反之，假如王安石新法成功，後世又有英明的皇帝相繼在位，如像商鞅變法以後的秦國一樣，那末商鞅之法尚使秦併六國，統一天下，王安石之法將使宋的文治武功達於何等隆盛的局面，誠非我人所能想像。那時候真是遼金不足滅，西夏不足平，那裏會有什麼外患呢？

但新法既未能圓滿實現，安石富國强兵的志願頓告幻滅，北宋的右文輕武的風氣却愈加惡化，恰值女真暴興，童貫蔡京當權，於是國事便不可收拾了。道聽塗說之輩，以爲新法亡宋，那真是千古的奇寃了。

## 第二節　童貫

童貫的地位——在兩宋的許多皇帝之中，神宗可算得有爲之君了，但不幸得很，他

童用王安石既未能克償宿願，而他的任用宦者李憲執掌兵權，卻開了宦者童貫的進身之階，童貫又引進了蔡京，二人勾結一起，成爲徽宗的左右手，終於一起亡了北宋。研究宋史的時候，童貫蔡京幾乎不能分開，但大概說來，童貫主持軍權，造成外患，蔡京主持政權，造成內亂。本文既側重外交，故舍蔡京而言童貫。

宋史宦者列傳載童貫的歷史，約略如左：

童貫的生平——『童貫少出李憲之門，性巧媚自給，事宮掖，即善策人主微指，先事順承。……政和元年，進檢校太尉，使契丹，或言：「以宦官爲上介，國無人乎？」帝曰：「契丹聞貫破西羌，故欲見之，因使覘國，策之善者也。」使還，益展奮廟謨兵柄皆屬焉。……使遼時得燕人馬植，歸薦諸朝，遂造平燕之謀，選健將勁卒，剋日發命，會方臘起睦州，勢甚張，改江浙淮南節度使，即以所聚兵帥諸將討平之。……臘雖平而北伐之役遂起。既而以復燕山功，詔解節鉞，眞三公。……宣和七年，詔用神宗遺訓，能復全燕之境者，胙本邦，疏王爵，遂封廣陽郡王。是年金粘沒罕南侵，貫在太原，遣馬擴辛興宗以賞金，金人以納張穀爲責，且遣使告興兵。貫厚禮之，謂曰「如此大事，何不素告我？」使者勸貫速割兩河以謝。貫氣褫不能應，謀遁歸。太原守張孝純誚之曰：「金人渝盟，王當令天下兵悉

力枝梧，今委之而去，是棄河東與敵也，河東入敵手，奈河北乎？」貫怒叱之曰：「貫受命宣撫，非守土也，君必欲留貫，置帥何爲？」孝純拊掌嘆曰：「平生童太師作幾許威福，及臨事乃蓄縮畏懾，奉頭鼠竄，何面目復見天子乎？」貫奔入都，欽宗已受禪，下詔親征，以貫爲東京留將，貫不受命，而奉上皇南巡。於是諫官御史與國人議者紛起，初貶左衛上將軍，連謫昭化軍節度副使，竄之英州吉陽軍，行未至，詔數其十大罪，命監察御史張徵迹其所至蒞斬之，及於南雄。既誅，函首赴闕，梟於都市，貫握兵二十年，權傾一時，奔走期會，過於制敕。……岳牧輔弼，多出其門，廝養僕圉，官諸使者，至數百輩，窮姦稔禍，流毒四海，雖菹醢不償責也。」

他的聯金滅遼策——童貫的姦惡情形，這裏不再多說。他在宋代外交上的重要地位，在於他掌握徽宗一朝的軍政外交，而爲聯金滅遼策略的主持人物，聯金滅遼的目的，是要摧滅傳統的强敵；恢復中國的故土，其前後經過，備見上章第三節。至於契丹爲患於宋的事實和燕雲十六州形勢上的重要，本文已再三言之。爲了實現這些目的，那末利用遼方衰弱的機會，聯絡一個東北新興的小國，來實現這些目的，在當時普通人看來自然是一個良好的策略，但這個策略卻取得了最大的失敗。這番失敗，不能說是

童貫一人的失敗，而是北宋一百六十年間外交內政腐敗混亂的情形下，層層相因的一種失敗，也是一種崩潰。這是看了本文前面所論的宋代立國的方針，偷惰的風氣，苟安的政策，以及王安石屬世變俗的努力的失敗，就可以明瞭的。

該策與南京聯蒙古滅金一策的比較——至於這種聯盟式的以夷制夷政策，在童貫之前有宋太宗聯渤海高麗夾攻契丹的企圖，在童貫之後，有宋理宗的聯蒙古以伐金，然而現在論起來，三者之中，童貫的聯金滅遼最爲失策。宋太宗的那番企圖，好在當時宋的勢力遠過渤海高麗，所以不能與隨後的兩次同日而語。至於南宋時會同蒙古兵伐金，有幾個特殊的環境，一則宋金世仇，國恥未雪，失地未復，二則金宣宗不知與宋團結圖存的重要，卻因宋停解歲幣之故，遽爾興兵伐宋；三則遣兵伐金之議，主動者爲蒙古，這是一種大國的命令，宋不容易拒絕。徽宗時童貫的聯金伐遼則不然，一則宋遼和好已久，燕雲十六州乃石晉賂契丹者，並非宋的失地；二則連金之議，主動者爲宋，在金方本無此意。

聯金滅遼之害——假如童貫當時並無聯金滅遼的策略，宋方並不遣使渡海赴金，委曲求全，許以歲幣，那末金方覬覦中原之心，一時不致萌芽，這是第一點；童貫如約前

往攻遼，卻屢爲遼耶律淳等所敗，燕京卒爲金人獨力攻克，宋的微弱無用因此顯著，紙老虎戳穿，遂啓金人入寇之心，這是第二點，這兩點是確實的情形。再有或許的一點，即宋方假如當初對於遼金的爭鬥袖手作壁上觀，到後來看到金勢猖獗，遼方危殆的情形，倘給予遼以盡力的援助，遼或許不致滅亡。

歷史上的事實不能再演，我人只能假定而已。無論如何，宣和時期聯金滅遼的策略，終是敗於未能知彼知己，不知金勢的强盛，不知自己軍力的窳敗，不自量力，胡塗昏聵，以致促成了北宋的覆亡。

童貫不足責——但以童貫本人而論，原係宦官出身，不學無術，以致有此失策，誠不足責，致於徽宗以軍政外交，托付與一個宦官，卻是可怪，我人以童貫當時的環境而言，他一舉而平西羌，因此而有圖遼的野心，他出使於遼的實地觀察，和趙良嗣向他遊說的結果，使他的野心益發煽動。同時金方攻遼的迅速進展，又使他惟恐燕雲十六州將爲金人攻下，那末在他視爲垂手可得的王爵，要拿不到手了，所以他亟亟於出師以求不世的功名。在他出師征遼之前，他又一舉而平方臘，這次勝利的容易，使他益發認爲遼必可滅，金不足懼，一個不學無術的宦官，生活於舒服容易的環境，那能知彼知己，那

能度德量力，所以伐遼則爲遼所敗，聯金則爲金所棄，國家費了極大的代價，換得燕雲七座空城，童貫卻功成名遂，做他的南面王了。

## 第三節　賈似道與文天祥

賈似道的地位——自從南宋理宗寶祐年間起，直到度宗崩，（一二五三——一二七四）掌握南宋內政外交大權的便是賈似道。他的奸惡的情形實在童貫蔡京之上。他不僅在對內的行政上亡了南宋，又在對外的交涉上，招了亡國之禍。所以他是兼童貫蔡京爲一人，負有雙重的亡國之罪。

賈亦不足怪——但賈似道執政期間的內政外交，事實上無非是南宋期間苟生偷活，過一天是一天的心理發揮到了最高度而已。當時人指責他說：『今天下之勢，十去八九……而乃酣歌深宮，嘯傲湖山，玩歲愒日，緩急倒施……』這是亡國君臣常有的現象，毫不奇怪。

他的時代心理——講到賈似道的外交，他隱匿了他在鄂州與蒙古所訂的和約，不敢發表，又拘留蒙古使臣郝經，惟恐他洩漏和約內容，這樣在蒙古自然師出有名了。同

時他又不修戰備，不救襄陽，這種昏瞶糊塗，對外的無政策，驟視之，真是一樁大笑話，但仔細審察，他的無政策，正是覺得無法可施，所以僥倖度日，苟延殘喘。在他年齡漸高，過了三十年榮華富貴的享樂生活，但求保得天年和祿位，那末等到冥目長逝以後，元兵前來舉討與否，也和他不相干了。在當時南宋泄泄沓沓的風氣中，這種心理是很自然的，這是一點。

南宋的輿論——第二點，賈似道所以隱匿和約不敢發表，這也因爲宋代輿論的勢力很大，雖在南宋將亡時也未可輕侮，只是當時的輿論已從正言極諫，流爲輕薄的幽默而已。（例如汪立信致書賈似道，說蒙古入寇，以聚兵防江爲上策，遣使議和爲中策，『二策皆不克行，則天亡我矣！銜璧輿櫬之禮，請備以俟。』但似道對上中二策均不採用，有人賦詩道：『厚我壖垣長彼貪，不然銜璧小邦男，廟堂從諫真如轉，竟用先生策第三！』可見當時輿論輕薄的一班。）雖然他是最高的權臣也不能不顧忌，顧忌的結果竟要拘禁來使，殊不知這位蒙古使臣郝經，自陳『願附魯連之義，排難解紛，豈如唐儉之徒，款兵誤國？』他既爲了和議而來，一切自可商量，而賈似道則心慌意亂，竟採取了最下的下策。

文天祥的突出——在南宋這一種亡國的空氣中，竟能產生文天祥那樣忠義的人物，猶如因循守舊的北宋，竟能產生改造家王安石一樣的是非常而偶然的事情。將以一死爲天下後世勸！

文天祥生於宋理宗嘉熙元年，（西歷一二三七）二十歲時即以進士第一名及第，考官王應麟奏他『忠肝貫金石，古誼若龜鑑，臣敢爲得人賀。』但自後因上書直諫，屢忤當道，於是罷官家居，恭帝既立（一二七五）詔天下勤王救國，天祥捧詔涕泣，聚衆萬餘人往赴國難，『其友止之曰：「今大兵三道鼓行，破郊畿，薄內地，君以烏合萬餘赴之，是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？」天祥曰：「吾亦知其然也，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，一旦有急，徵天下兵，無一人一騎入關者，吾深恨於此，故不自量力，而以身狥之，庶天下忠臣義士，將有聞風而起者，義勝者謀立，人衆者功濟，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。」』（見宋史及宋史紀事本末）

這可見天祥明知當時係不可挽回的局面，但欲以身狥國，來激發天下後世的忠君愛國思想。他底必死之心，這時已斷然決定的了。

他的主戰——同年八月，天祥提兵至京城臨安（今杭縣）便竭力主戰。當時兵部尚書呂師孟『偃蹇自肆，』天祥上疏說道：『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，奮發剛斷之義少。

乞斬師孟釁鼓，以作將士之氣』又說：『本朝懲五季之亂，削藩鎮，建都邑，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，然國以寖弱，故敵至一州，則一州破，至一縣，則一縣殘，中原陸沉，痛悔何及？今宜分境內為四鎮，建都統居中，以廣西益湖南，而建閫於長沙；以廣東益江西，而建閫于隆興，以福建益江東，而建閫於鄱陽，以淮西益淮南，而建閫於揚州；責長沙取鄂，隆興取蘄，番陽取江東，揚州取兩淮，地大力衆，乃足以抗賊，約日齊奮，有進而無退，日夜以圖之，彼備多力分，疲於奔命，而吾民之豪傑者，又伺隙出於其中，如此則敵不難卻也。』

在天祥的心目中，蒙古為夷狄之族，堂堂大宋，文明的古國，決無降服之理，而且一心決戰，則衆志成城，尚有一線的希望，當時與他有同樣眼光的，可說只有張世傑等數人而已。

恭帝德佑二年正月『甲申，元伯顏至長安鎮，宋丞相陳宜中違約不往議事，伯顏乃進次皋亭山，阿剌罕董文炳之師皆會，遊騎至臨安府北關，文天祥張世傑請移三宮入海，而己帥衆背城一戰，宜中不許白太后，遣監察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降表曰：「宋國主㬎，謹百拜奉表言，㬎眇然幼沖，遭家多難，權奸賈似道背盟誤國，至勤興師問罪。㬎非不能趨避以求苟全，今天命有歸，㬎將焉往？謹奉太皇太后命，削去帝號，以兩浙，福建、江

東西、湖南、兩廣、四川、兩淮見存州郡，悉上聖朝……」……戊子，命文天祥，吳堅、謝堂、賈餘慶使元軍，見伯顏於明因寺，天祥因說伯顏曰：「北朝若以宋為與國，請退兵平江或嘉興，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，北朝全兵以還，策之上也。若欲毀其宗社，則淮浙閩廣，尚多未下，利鈍未可知，兵連禍結，必自此始。」伯顏以北詔為辭，顧天祥舉動不常，疑有他志，留之軍中，遣堅等還，……且以其降表不稱臣，仍書宋號，遣程鵬飛、洪君祥偕來使賈餘慶復往易之。」

當時局面與賈似道時的不同。——這裏可見當時朝廷雖降，文天祥始終並無降意，他與伯顏議和，也僅以納歲幣為條件，不肯稱臣，他的大義凜然，始終不渝的節操，可以他後來的行事，和最後從容就義的情形為證明。按他這番的議和條件，用在十五年前賈似道與忽必烈鄂州訂約的時候，或許能夠得到元方採納。但賈似道那時，南宋大勢猶在，險要未失，他卻已心驚胆戰，一味求和，訂下了稱臣納幣和割地的條約。

以今日的眼光，而且純從外交方面來說，蒙古自成吉斯汗至忽必烈期間的兵力，拿來滅亡區區南宋，實在容易之至，所以在當日的情形下，便是賈似道的稱臣割地納幣的辱國條約，也未嘗不是一種苟全的辦法。可是賈似道偏又畏首畏尾，等到蒙古兵退，

方纔想到輿論不許，於是不敢發表，還要拘禁來使。十五年的光陰便這樣悠悠地過去南宋的國勢愈蹙，蒙古的野心愈熾，這時候雖然稱臣納幣割地、也不能使蒙古饜足的了。

他的值得欽敬——文天祥深深明白這時候的局面情形，他知道稱臣無益，適足增羞；他與伯顏議和是假的，要一覘元軍內容是真的。但忠肝義胆的文狀元，自然不能勝任間諜的工作，因此『舉動不常，』引起伯顏之疑，而被拘留起來。我人在六百數十年後，緬想當時的情境，愈加可以明白南宋到了文天祥勤王的時候，中華民族唯一的出路只有誓死決戰而已。明知抵抗不過，然而抵抗則庶幾天下後世『忠臣義士，將有聞風而起者！』（文天祥語，見前）果然文氏就義後七十年，而方國珍郭子興張士誠朱元璋等紛紛起事，元室竟亡。可見文氏不僅『忠肝貫金石。』而他識見的遠大，判斷的正確，意志的堅決，俱足為我人今日的師法的！

# 第五章　結論

綜論兩宋三百二十年的外交，簡直無一是處。幽燕為中國舊時的失地，在力能收回

時不予收回，（太祖不納曹翰之議，太宗高梁河敗後未能再接再厲，）而不能收回時卻要收回（童貫北伐）；西夏在李繼遷的時期不提一旅之師加以消滅，而養癰成患，後來傾全國之兵，也消滅不得，與金既已訂有條約，對蒙古既已立有和議，而屢次背約悔和（徽宗時納張瑴，賈似道拘郝經等等，）自召滅亡；在可戰之時不戰（高宗秦檜之殺岳飛）在可和之時不和（蒙古遣使議和修好，宋一再扣留不報；）大錯不一而足，兩朝覆轍相尋，這種外交，無以名之，名之為「亡國的外交」。

這種外交的所以產生，一言以蔽之，是由於內心的苟安姑息，外表的慷慨激昂，惟其內心的苟安姑息，故有整理內政之時機而不能奮，惟其外表的慷慨激昂，故一動即敗。不得已只有依賴他人以自張其目，沒出息到極點，只有依賴外人，勾結外人，諂事外人；當遼金無意入主中原的時候，宋政府年年納之以歲幣，事之如上國，但求以金錢買得安逸，藉此粉飾太平，決不肯及時整頓國政，嚴修武備，於是到了兩個敵國在卧榻之旁，大動干戈的時候，又附和了一個國勢強盛的敵人，去滅亡一個國勢凌夷的敵人。所以起初是聯女真滅遼，遼滅而北宋亡於金；一百餘年後又聯蒙古以滅金，金滅而南宋亡於元。一種顯而易見的大錯，而堂堂大宋，竟演之再演，豈不可驚。

可是這一種不自振作而依賴他人的辦法，不僅於宋為然，後來更見之於吳三桂的借兵滿清，李鴻章的『以夷制夷』差不多成了政府的傳統政策，民族的傳統心理，以致今日的外患嚴重，而內亂不已，均非無故，而由來已久。我人又將如何懲前毖後，來改變這一種習俗風氣呢？我人將仿效王安石的變法，或童貫的聯金滅遼，或學賈似道的偷生苟活，抑或師法文天祥的决死抵抗呢？這些是研究『宋之外交』以後，自然而然地湧現在我們心頭的問題。

吾人可以引用王船山的兩篇史論，來結束北宋南宋的兩段故事。北宋亡矣，而南宋何以獨能自存，則曰：

『兀朮渡江而南，席卷吳會，追高宗於四明，東迤海濱，其別將追隆祐太后，南至於虔州之皁口，西掠楚疆，陷岳澤而武昌在其懷袖。當是時也，江南糜爛，宋無一城之可恃，韓岳寄於散地而莫能自堅，此苻堅所幾幸而不得者也。舉天下而全有之，奚待蒙古之於他日哉。然而兀朮急於渡江而歸，高宗且可畫淮而守，此以知國家安危之機，非一朝一夕之故矣。女真之不能久處江東也，若有所怵惕，而夢寢不安，非其欲之有所厭也，非其力之不足恃也，攻有餘而守不足者，無與故也。深入國境而

能因而據之者，必有擁衆降附，代爲招集之人，故劉整呂文煥降於蒙古而後宋不能免於土崩。地非其地也，人非其人也，風土之剛柔，山川之險易，人心之向背，乍履其地，而無以相知，安能孤軍懸處，設守令而無憂其困，師行千里而不見敵者，心必危、烏合以附而無任其安輯者，信之必不固。則兀朮之方勝而懼，得地而不敢有，所必然矣。夫宋之得此於天下，雖無片土之安，而將帥牧守，相持以不爲女眞用，固有以致之也；其於士大夫也，亦幾失其心矣，然而誅夷不加焉，鞭笞愈不敢施也。其於武臣也，猜防之而不使展其勇略，是以弱也。然而有功未嘗故挫抑之，有過未嘗深求之，不縱之於先而操之於後，則怨不深，不操之已窮而縱之使傲，則情不悖，故武人猶思媚於君，而部曲不從逆以靡。天下之大勢，十去八九，而士心協，民志定，軍情猶固，宋之所以立國百餘年如一日，而瀕危不改其恆也。至於史嵩之賈似道起，士心始離，民心始散，將帥擅兵，存亡自主，而上不與謀，然後望風瓦解，蒙古安驅以入，晏坐以撫拾天下如一羽，而無所疑，不然劉呂雖降，安能舉我所豢養之吏士直前相搏而樂附狄夷如其父兄也哉。斬刈亟則小人易激，鞭笞用則君子亦離，部曲衆而封賞早，則去來自恣，孤旅危而應援絕，則反噬必深，上與下泮渙而不相知，敵乃

坐敗之而反爲吾腹心之患。宋之亂政至蔡京當國，童貫臨戎而極矣，而凡數者之病猶未劇也，是以高宗跳身航海，而終不亡也。」

至於南宋之亡則船山呼天搶地之哀聲，至於今猶震驚我人耳鼓，雖其說容有過當，然近代之民族主義，由此其先焉，則不能不重錄之以終篇：

『漢唐之亡也，皆自亡也，宋亡則舉黃帝以來道德相傳之天下而亡之也，是豈徒徽欽以降之多敗德，蔡秦賈史之挾姦私遂至於斯哉，其所由來者漸矣。古之言治者曰：覲文匿武，匿武云者，非其銷之之謂也；藏之也固，用之也密，不得覲而自成其用之謂也。一室之棟，一二而已，欂櫨榱桷，相倚以安，而不任競之力，故用之專者，物莫能勝，守之一者，寇莫能侵，率萬人以相搏，而其相敵也，一與一相當，而羣無所用。自邊海以西，迄於夏朔，自賀蘭以南，垂於洮岷，其外之逐水草，工騎射，好戰樂殺，以睥睨中土者，地猶是地，人猶是人，自古迄今，豈有異哉，自春秋以及戰國，中國自相爭戰，而燕趙獨以二國之力，控制北陲，秦人外應關東，而以餘力獨捍西圉，東不貸力於齊，南不藉援於韓魏，江淮以南則尤耳不聞朔漢之有天驕也。及秦滅燕代，併六合，平天下之力以防胡，而匈奴始大，漢竭力以禦之，而終莫之能抑，晉兼三國而

五胡競起，亟及於唐，突厥契丹相仍內擾，及安史之亂，河北叛臣，各據數州之土，以抗天子，而薊雲之烽燧不聞者百年。由此言之，合天下以求競而不競，控數州小匿而武而競莫加焉。則中國所以衛此覩文之區者，大略可知矣。東漢之強不敵西漢，而無北顧之憂者，有黎陽之屯在焉，天寶以後內亂方興，不敵開元以前，而無山後之警者，有魏博之牙兵在也，外重漁陽上羣雲中之守，而黎陽承其後，外建盧龍定難振武之節，而魏博輔其威，以其地，任其人，以其人，守其地，金粟自贍也，士馬自簡也，險隘自固也，甲仗自營也，無巡邊之犬使，以督其簿責，無遙制之廷臣，以掣其進止，雖寡而眾矣，雖弱而強矣。故曰：「天子有道，守有四夷」，言四裔之邊臣各自守，不待天子守也，牽帥海內以守非所自守之地，則漫不關情而自怠奔走，遠人以戰非所習戰之方，則其力先竭，而必頹然，而庸主具臣之謀，固必出於此，事已迫則不容不疲中國以爭，難未形則唯恐將帥之倚兵而侵上也。嗚呼，宋之所以裂天維，傾地紀，亂人羣，貽無窮之禍者，此而已矣。其得天下也不正，而厚疑攘臂之仍，其制天下也無權，而深懷尾大之忌，前之以趙普之佞，逢其君猜妬之私，繼之以畢士安之庸，徇愚民姑息之逸，於是關南河北數千里閒若無人，迫及勍敵介馬而馳，乃毆南方

不教之民，震驚海內，而與相枝距，未戰而耳目先迷於嚮往，一潰而奔，保其鄉曲，無可匿也，斯亦無能競也，而自軒轅迄夏后以力挽天綱者，靡散於百年之內，鳴吁天不可問，誰為為之，而令此極乎？嚮令宋當削平僭偽之日，宿重兵於河北，擇人以任之，君釋其猜嫌，眾寬其指摘，臨三關以扼契丹，即不能席卷燕雲，而契丹已亡，女真不能內蹂，亦何至棄中州為完顏歸死之穴，而召蒙古以臨淮泗哉，人本自競，無待吾之競之也，均此同生並育於聲名文物之地以相為主輔，而視若芒刺之在背，威之弗能也，信之弗固也，牢之弗法也，棄其人，曠其土，以撩支宇，而棟之折也已久，孰令宋之失道，若是其愚耶。天地之氣五百餘年而必復，周亡時天下一，宋興時割據絕，復有起者鑒於斯以立國，庶有待乎平其情，公其志，立其義，以奠其維。斯則繼軒轅大禹而見為天地之肖子也夫！」

但是天下有不容易改變的心理，無不可教藥的國家，華族得了兩度的復興經驗，受了兩度的敗亡苦痛，只教將從前的失敗與成功不忘記，終久是不會失敗的。因為宇宙間有一個鐵則：孫子說得好，「能為不可勝，不能使敵必可勝，不可勝在己，可勝在敵。」這是向強者方面說的，孟子道，「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。」這是向弱說方面說的，實在

是一個鐵則，名之曰「君子求諸己。」沒出息的宋朝外交，聯金滅遼，聯元滅金，結果把天下整個送了，這叫做「小人求諸人！」